ZHONGGONG HEFEI SHIWEI DANGXIAO XUEBAO

ISSN 1674-5000
CN 34-1249/Z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王玉堂　全球视阈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本质要求与世界意义
李　槿　近十年我国基层党建创新的特点、动因与绩效
汪晓梦　安徽省科技创新环境评价研究
陈华彬等　安徽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及路径选择

2022年第6期（总第98期）
第21卷　双月刊　11月30日出版

征稿启事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是中共合肥市委主管，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合肥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本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关注改革发展前沿问题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围绕省情、市情选稿组稿，大力开展政策研究、市情研究、咨政研究和理论宣传，形成了具有浓厚时代特征、地域特点、党校特色的理论宣传平台。

本刊于2003年入编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进入CNKI中心网站。现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2015年初，本刊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为首批学术期刊。为进一步提高本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将本刊打造成为“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的学术名片和重要窗口”，现向社会公开征稿，热诚欢迎广大社科工作者惠赐佳作。

投稿须知：

1. 稿件应当主题突出、观点鲜明、论证严密、语言文字合乎规范，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本刊特别欢迎关于“安徽省情、合肥市情”方面的研究报告。

2. 稿件字数以4000-10000字为宜。

3. 将正文以附件形式发过来，并将单位名称、详细地址、邮编、电话、电邮、摘要、关键词（3-5个）、来稿日期、作者简介（出生日期、民族、职称职务、学历学位、研究方向等）放在正文标题下。

4. 参考文献、注释等放在文尾，勿用脚注或夹注。注释是作者对题名、标题或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须放在正文后的参考文献之前，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注：①、②、③……。参考文献是作者写作论文时所用引文的出处或参阅的各种书刊资料，须集中列在论文的文末，参考文献序号标注：[1]、[2]、[3]……

5. 来稿文责自负，在不改变文章主要观点的前提下本刊编辑部有权对文章作适当修改，若作者不同意修改请在来稿时作特别说明。

6. 本刊已被“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等收录，如作者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在网站或光盘上同时刊出。

7. 请勿一稿多投。本刊的选稿周期为3个月，3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的，作者可自行处理。请作者自留底稿，来稿一律不退。

8. 本刊选稿以质量为唯一标准，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稿酬并寄送2本样刊。

9. 本刊目前并无网上投稿平台，也未委托任何组织或个人代为征稿。一些打着本刊所谓“官网”名义的网上投稿、征稿平台，骗取作者审稿费、发表费的行为，均与本刊无关，均属非法行为。请投稿作者切勿上当受骗。

本刊样刊浏览网址：http://hfdx.hfzhi.com/

本刊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901号《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邮政编码：230031

联系电话：0551-62206658　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2022年第6期
（总第98期）
双月刊

主管单位：中共合肥市委
主办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
出版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陈得良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俊　王辉龙　王良仲　王　义　王　玉　王智源　江　飞
江　浩　刘玉勉　孙维红　陈得良　何永义　李安福　李敏琪
李宗开　范观兵　金　玥　周良金　胡爱敏　胡厚翠　凌德政
陶晓娟　黄传霞　程千宜　瞿晓陆

主　编：马　俊
编　辑：黄宁平
朱少家
徐书琴

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全球视阈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本质要求与世界意义……王玉堂(3)

近十年我国基层党建创新的特点、动因与绩效

——基于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的多案例文本分析……李　槿(10)

策论园地

安徽省科技创新环境评价研究

——基于与江浙沪的比较……汪晓梦(17)

安徽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及路径选择……陈华彬　陈再勤　孟超峰　胡峰(23)

合肥市推进林长制改革的主要做法及提升策略……王永龙　夏琦　尹俊　朱梦姗(28)

长三角地区旅游消费潜力释放机制与路径研究……武优勐　匡祖欣　杨丽姣(30)

“城市大脑”建设：价值意蕴、短板审视与优化路径……刘雅静(36)

版权声明

本刊已许可本刊合作单位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发　行：《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通信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901号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0551)62206658；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674-500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4-1249/Z

学思札记

国内学界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杨荣刚(41)

信息荟萃

“创新驱动 安徽跨越”等七则……(48)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2年总目录……(62)

全球视阈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本质要求与世界意义

王玉堂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形，“本质要求”是核。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且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模式的探索，进而以更加坚实、稳健的步伐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新的选择，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普遍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特色　本质要求　世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党领导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且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模式的探索进而以更加坚实、稳健的步伐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新的选择，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普遍的世界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

现代化发轫于西方，曾一度被片面地解读为现代化即西方化甚至美国化。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经历了一个艰辛探索、艰难曲折的漫长过程，最终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有了主心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了领路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一代代共产党人的筚路蓝缕、不懈努力、接续奋斗，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

收稿日期：2022-11-07

作者简介：王玉堂，山东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合作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道路，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肥土沃壤上发展起来的，但“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2]，而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版，是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出发，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奋斗形成的创新版、超越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承载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劫难、涅槃重生的历史记忆，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图强求变、砥砺奋进的辉煌历程。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有志气、有智慧和极富历史创造力的人民，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秦时期的墨家在力学、数学、几何学、光学、声学等诸多领域的辉煌成就，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顶峰，让当时的西方人难以企及[3]；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四大发明”，更是“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4]261。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和民族蒙耻受辱，面临生死存亡的空前危机。为了救国家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谋民族之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英勇奋斗，苦苦探寻救国、兴国之路，孜孜求索发展、进步之道。从试图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实现器物现代化的洋务运动到以制度现代化为目的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从器物到制度，屡屡尝试却都屡屡失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

历史主动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5]。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自觉担当、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不懈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浴血奋战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艰辛探索，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杀出一条血路”的奋力开拓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守正创新，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历经千山万水，战胜千难万险，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伟大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

需要说明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真正开始对现代化建设进行思考、谋划和探索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至新中国成立初；1953 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和把握总是有着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1945 年，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6]1081 1954 年，周恩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7]132 1957 年，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强调“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8]207。后来他又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9]341 1964 年，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后来家喻户晓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7]439，并在 1975 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设想 [7]47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

的总设计师，开始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行系统思考、整体设计、全面谋划，并首次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0]163 的重大论断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把“实现小康”作为阶段性目标，由此拉开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团结带领人民在“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1]的历史新起点上，乘势而上，阔步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11]153

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4]272-273 奋进自古无坦途，前行路上多险阻。在内忧外患中诞生、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斗争精神是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政治品格。一路走来，我们党历尽千辛万苦，以不畏强权、不惧强敌、不怕困难的志气、骨气和勇气，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面向未来，困难和挑战非但不会比过去少，而且随时可能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但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一定能够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续写现代化建设新辉煌，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一种文明形态，“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2]9。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说明中国式现代化认同并注重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海纳百川、开放自信的包容精神和天下情怀；中国式现代化“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既有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模式、现代化样态，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和创造伟力。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12]9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迄今为止，全球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约为 10 亿[13]129，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超过现有现代化国家的总和，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有资料表明，17 世纪，荷兰崛起时人口是百万级的；19 世纪，英国崛起时人口是千万级的；20 世纪，美国崛起时人口是上亿级的[14]15。如何将社会主义建设与 10 多亿级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具体国情相结合，变人口压力为发展动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破解了如何在超大规模国家实现现代化这一世界性难题，不仅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历史性超越，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现代化，既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伟大创举，更是对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理论和实践独特而伟大的历史性贡献。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15]。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1]142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是以人民中心的立场在发展成果、财富分配上的体现，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

份。”[16]495 在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对共同富裕的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7]364 在这一时期，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入新时代，党科学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团结带领人民通过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的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主动地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问题，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4]52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纵观历史，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确立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18]164，时刻警惕伴随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的道德衰败，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避免了重蹈一些国家和地区以资本为中心进而导致物质主义膨胀、精神世界衰落的覆辙。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明确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1]。

（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9]39“草木植成，国之富也。”（《管子·立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工作，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力争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全人类作出积极贡献。

（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8]157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1]，“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19]436。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解放全人类的学说，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20]521，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逻辑，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创造的文明和现代化，是文明光环笼罩下的野蛮与血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而是对人类现代化的挑战与亵渎；提出并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奉行扩张主义、霸权主义的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具有根本性区别。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摒弃了西方现代化弊端，突破了部分发展中国家受制于人的困境，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毋庸置疑地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是一条“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1]的和平发展之路，是一条“强而不霸”的大国复兴之路。

以上五个特色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强调国情，有什么样的国情就有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调协调，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必须协调，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物质”和“精神”必须协调，不能富了口袋穷了脑袋；人与自然必须协调，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一时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价值取向，西方一些国家以资本为中心，通过巧取豪夺实现现代化；我们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和平发展实现现代化。

三、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作出集中概括，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深刻总结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在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11]153，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特色”是形，是外在的；“本质要求”是核，是内在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深刻认识、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1]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际，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核心密码和最本质的要求；离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命题便不能成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毫不动摇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4]9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属性和本质要求，牢牢把握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始终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现代化。

（三）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现代化的基本依托，没有高质量发展就没有高水平现代化，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牢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我们党始终高举的旗帜。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10]322。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的统

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五）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1]我们要建设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不仅要物质上富足，更要精神上富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21]83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党领导的现代化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4]4，不断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高品质生活，在团结奋斗、共同奋斗中实现共同富裕。

（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实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阴霾未散，乌克兰危机仍在持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世界形势更加错综复杂，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必须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九）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把握新的历史特点，加强战略谋划，把握战略机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稳步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四、充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23]。中国式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人类现代化的中国范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豪迈的中国气派、深邃的中国智慧，而且深刻改变了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格局，“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9]8-9，因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为突破西方现代化模式提供了硬核化的范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4]273现代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人类走向现代化可以有多种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而且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的实践。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行动最有说服力[24]。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成功推进和拓展，从实践层面打破了“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局限，以引人瞩目、令人叹服的现代化建设成就，雄辩地证明“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从各自实际出发，找准正确方向，风雨无阻向前行，就一定能

够实现现代化；从理论层面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禁锢，基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逐渐建构起了新型现代化理论；从话语层面丰富了现代化话语表达体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解读中国道路、诠释中国理念、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的原创性概念体系，有助于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

（二）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可行性借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到如今建成世界上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在发展的很多方面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所罕见、震古烁今的奇迹。中国的发展奇迹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大势，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不仅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而且揭示了人类社会追求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我们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整体小康，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等方面，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鲜活的经验。

（三）中国式现代化为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多路径的选择。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5]669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从哲学的视角看，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会有关联，有关联就有互融和借鉴，但推进路径、方式、节奏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国情决定道路。这种差异性是由各国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的。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化和由此创造的人类文明的多样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的文明发展道路有着本质的不同。所谓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就新在与既有文明形态的区别上。中国式现代化坚决摒弃国强必霸的逻辑，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坚决摒弃以资本为中心的模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取向；坚决避免两极分化的问题，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坚决摒弃征服自然的错误观念，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科学解决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大党胸怀、大党格局、大党担当。中国式现代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面向未来，在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实现创新发展，在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全新的路径选择。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11]427。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战略谋划、作出了顶层设计，确立了奋斗目标、重大原则和行动纲领，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校准了航向、提供了遵循。党领导人民通过不懈奋斗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一定能够沿着这条内蕴全人类共同理想、共同追求、共同价值的光明之路行稳致远，走向更加辉煌、更加美好的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

[3]王玉堂.试论墨家的组织特征[J].职大学报，2020(3)：23-27.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王玉堂.发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2(4)：3-7.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下转第22页)

近十年我国基层党建创新的特点、动因与绩效
——基于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的多案例文本分析

李 槿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江苏 南京 210024）

[摘要]通过对第三、四、五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评选出的90个最佳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发现基层党建创新内容主要聚焦在：加强基层组织功能和党建基本保障基本制度创新；创新呈现“多点开花”的良好态势，但也表现出“东部强、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稍弱”的特点；创新主体以政府机关为主；上级要求、问题驱动和环境驱动是创新的主要动力；创新产生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绩效。同时，基层党建创新地域不平衡、主体不平衡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关键词]党的建设　基层党建创新　创新案例　文本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从战略高度对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围绕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为基层党建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

全国各地基层党组织主动探索创新，在基层党建创新被高度重视、实践成果不断涌现的背景下，我国基层党建创新有哪些特征？创新的动力是什么？创新成效如何？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人民网等近十年开展的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所评选出的最佳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尝试对全国基层党建创新的特点、动因及绩效等进行研究，进而刻画出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全景样貌。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回顾

当前学界对基层党建创新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一是从理论机制层面开展研究。王长江探讨了当前推进基层党建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立足点、着眼点、动力和顶层设计问题[1]；王芳指出了当前基层党建创新工作的问题、原因及人民立场视角下基层党建创新的路径选择[2]；张书林研究了新时代基层党建创新的困境与路向[3]；刘洁、王雯姝从目标维度、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对加强基层党建进行了论析[4]。二是从创新实践层面开展研究。温丙存从政党逻辑与治理逻辑的耦合视角出发，

收稿日期：2022-11-22

作者简介：李槿，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助理研究员。

基于第五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的经验，探索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5]。杜鹏从党群关系的实践性出发，探讨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关联机制和农村党建困境的破解之道[6]。三是从媒介技术层面开展研究。刘笑言、于美美从制度空间、文化空间和过程空间三个维度探讨融媒体对我国城市基层党建的空间拓展[7]。黄泺、陈玉书指出，新时代要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构建“智慧党建”平台，用好、用活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手段，推动高校党建高质量发展[8]。李洪涛、吴其林指出，运用微信成为新形势下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重视并充分利用微信所具有的优势和条件，让“指尖上的高校党建”更加出彩[9]。

总体而言，学界对基层党建创新的既有研究缺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鲜有多案例比较研究。因此，对近十年基层党建创新进行多案例的文本分析，进行案例的横向和纵向比较，归纳概括基层党建创新的特点、动因和绩效，探索我国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格局，进而把握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规律，很有价值。

（二）分析框架

“框架”分析广泛应用于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中。欧文·戈夫曼（E.Goffman）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它能够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本文以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所评选出的最佳案例为基础，构建了基层党建创新的五要素分析框架。（1）基层党建创新的动因：党建创新为什么发生、哪些因素驱动基层党建创新。（2）基层党建创新的主体：谁在发起并推动基层党建创新、他们属于哪个层级。（3）基层党建创新的分布：基层党建创新的地域分布状况、呈现何种规律和特点。（4）基层党建创新的主题：基层党建创新作用对象的具体内容，在哪些领域创新中取得突破。（5）基层党建创新的绩效：基层党建创新产生了哪些成效和影响、为基层党建提供了哪些经验借鉴。

以上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基层党建创新的基本框架。基层党建创新的动因激发主体的创新行为，创新的推行实施产生相应的绩效，并回应创新发生的动因，形成完整的创新过程。

（三）资料来源

本文案例来自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组织人事报社联合举办的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评选活动。该活动发起于2009年，截至目前已完成五届评选，影响广泛。据主办方统计，五届活动共征集参评案例1万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已开展第三届（2013年7月—2015年7月）、第四届（2015年12月—2017年11月）、第五届（2018年9月—2020年7月）评选，分别以“创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基层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的实践”“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高基层党建质量”为主题向全国征集案例。每届评选经网上展示、网上公示、初评、复评和终评等环节，评选出最佳案例30个。总体来看，这一评选是目前全国基层党建创新方面权威和层次均很高的评选，这些案例覆盖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等各个领域，涵盖了基层党建创新的多种形态，覆盖面广、代表性强，能够全方位展示近十年基层党建创新的实践样态、前沿成果和发展趋势。本文以这三届评选产生的90个最佳案例为样本进行文本分析。

（四）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多案例文本分析研究法。文本分析将“文本”中的文字、图像等内容从零碎和定性的形式转化为系统和定量的形式，从而进行“量”的分析，克服纯定性研究主观性和不确定的缺陷，更深刻、精准认识文献的“质”。在本文中，90个最佳创新案例是主要研究对象，分析时将创新案例看成一套标准的问卷，在研读文本的基础上获取每个创新案例的主题、主体、区域、动因、举措、绩效等分析单元，进行编码，并对材料进行定量分析和阐释性解读，进而勾勒出近十年基层党建创新的全貌。

三、基层党建创新的特点

（一）主题分布

分析基层党建创新成果的主题可以更好地了解基层党建创新的着力点和重点所在。人民网对每届获奖案例都分10个左右的主题类别进行展示。为便于分析，本文将三届最佳案例的主题整合成六类。在六类主题中，“加强基层组织功能”占比最高，达34.44%（见表1）。党的基层组织发挥着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等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强、把基层政

权巩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才能稳固。”因此,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党建促脱贫、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等重大任务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成为基层党组织创新实践的重点、热点和着力点。加强组织功能在每届最佳案例中都占很大比重,且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趋势,在第四、第五届,“加强基层组织功能”的最佳案例占比上升至首位。

比重仅次于“加强基层组织功能”的是“党建基本保障基本制度创新”,在六类主题中占比33.33%。党员教育管理、党建信息化建设、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以及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等也是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主题,均有最佳案例入选。

(二)地区分布

从省份(以下将省、自治区、直辖市统称为省份)来看,最佳创新案例覆盖全国27个省份。数量前五的省份依次是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北京(见表2),共42个案例,占总数的46.67%。以上5个省份每届最佳案例数均位居前列,说明其党建创新具有较强的连续性。究其原因,一方面,江苏、山东、浙江、上海作为东部地区经济大省份,拥有十分稳定且可持续的创新环境基础以及扎实的自主创新能力;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在党建创新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另一方面,以上5个省份均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者,在实践中遇到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倒逼其进行改革创新。

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10省份入选最佳案例55个,占比61.11%,超过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总和。中部地区6省份入选13个,占比14.44%。西部地区12省份入选21个,占比23.33%。东北地区3省份入选1个,占比1.11%。

(三)创新主体

从这三届最佳案例的创新主体来看,政府机关是绝对主导力量,占比77.78%;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非公企业、居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这5类主体入选案例之和仅占22.22%,尤其是社会组织的入选案例最少,三届中仅有1个最佳案例。政府机关占比最高,是因为我们党历来重视机关党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机关党的建设是机关建设的根本保证。政府机关作为抓党建的“排头兵”,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阵地资源等,同时还有资金等方面的保障,能够充分发挥资源集约效应进行创新探索。从时间维度来看,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非政府机关主体最佳案例数量在逐步增加,占比从第三届的16.66%上升到第五届的26.66%。

表1 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主题分布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总计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加强基层组织功能创新（含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党建促脱贫攻坚、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等）	9	30.00%	8	26.67%	14	46.67%	31	34.44%
党建基本保障基本制度创新（含组织设置方式、城乡统筹党建格局建设等）	13	43.33%	8	26.67%	9	30.00%	30	33.33%
党员教育管理创新（含党员作用与党内关怀帮扶、理想信念教育、基层干部教育管理、党员教育管理监督等）	4	13.33%	6	20.00%	2	6.67%	12	13.33%
党建信息化建设创新（含互联网+党建等）	1	3.33%	6	20.00%	1	3.33%	8	8.89%
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创新（含基层党建责任制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严管厚爱强化干部担当等）	3	10.01%	1	3.33%	1	3.33%	5	5.56%
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创新（含严肃党内组织生活、发展党员和规范化管理等）	0	0	1	3.33%	3	10.00%	4	4.45%

注:六类主题是对人民网展示的三届最佳案例的类别进行归纳概括而得。

表 2 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省份分布情况

省份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合计
江苏	3	4	3	10
山东	4	3	2	9
浙江	3	3	3	9
上海	1	4	3	8
北京	1	2	3	6
贵州	2	3	1	6
广东	2	2	1	5
福建	1	2	1	4
湖南	1	1	2	4
江西	2	1	0	3
重庆	0	1	2	3
广西	0	1	1	2
河北	1	0	1	2
河南	1	0	1	2
湖北	1	1	0	2
内蒙古	2	0	0	2
陕西	1	1	0	2
天津	1	0	1	2
西藏	1	0	1	2
安徽	0	0	1	1
甘肃	0	0	1	1
黑龙江	0	1	0	1
山西	0	0	1	1
四川	1	0	0	1
新疆	1	0	0	1
云南	0	0	1	1

表 3 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分布情况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合计
东部	17	20	18	55
中部	5	3	5	13
西部	8	6	7	21
东北	0	1	0	1

可见，非政府机关主体越来越重视基层党建领域创新，创新能力越来越强，优质创新成果越来越多。

根据中组部 2022 年 6 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全国 9034 个城市街道、29649 个乡镇、114065 个社区（居委会）、491129 个行政村已建立党组织，共有机关基层党组织 74.5 万个，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 94.9 万个，企业基层党组织 153.2 万个，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 17.1 万个[10]。结合最佳案例数量来看，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非公

表 4 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创新主体情况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合计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政府机关	25	83.34%	23	76.67%	22	73.34%	70	77.78%
国有企业	2	6.67%	3	10.00%	3	10.00%	8	8.89%
事业单位	1	3.33%	1	3.33%	3	10.00%	5	5.56%
非公企业	1	3.33%	2	6.67%	1	3.33%	4	4.44%
居民自治组织	1	3.33%	0	0.00%	1	3.33%	2	2.22%
社会组织	0	0.00%	1	3.33%	0	0.00%	1	1.11%
总计	30	100%	30	100%	30	100%	90	100%

表 5 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机关主体分布情况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合计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省级部门	1	4.00%	0	0.00%	1	4.55%	2	2.86%
地级市	10	40.00%	8	34.78%	2	9.09%	20	28.57%
地市部门	1	4.00%	0	0.00%	6	27.27%	7	10.00%
区县	12	48.00%	12	52.18%	2	9.09%	26	37.14%
区县部门	1	4.00%	0	0.00%	10	45.45%	11	15.72%
乡镇、街道	0	0.00%	3	13.04%	1	4.55%	4	5.71%
合计	25	100%	23	100%	22	100%	70	100%

企业、居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在基层党建领域的创新活力还有待进一步激发，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

具体到政府机关，区县入选最佳案例的比例最高，占比 37.14%；地级市次之，占比28.57%；再次是区县部门和地市部门，而省级部门和乡镇(街道)入选案例较少。这表明，地级市和区县是基层党建创新最适宜的主体。

四、基层党建创新的动因及绩效

(一)创新动因

党建创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结合创新案例文本，可将创新动因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上级要求。主要包括上级政策要求、指导意见、工作部署、批示指示等。二是自身建设。主要包括创新主体在基层党建中面临的问题等。三是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外部需求、改革需要等。为进行量化分析，对案例文本中涉及的每个动因记一个频次，同一案例文本可能有多个动因。总体来看，上级党组织对基层党建的要求部署、基层党建问题倒逼驱动、外部环境对党建创新的需求是催生基层党建创新的三大主要动因。

1.“上级要求”动因分析。对案例文本分析可见，创新动力来自上级的有 45 个，即覆盖 50%的入选案例。上级党组织对基层党建工作高度重视，是基层党建创新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党建工作，对基层党建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基层党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近年来，党中央总揽全局，科学谋划，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制度治党，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党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召开了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电视电话会议、全国城

表 6 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的动因情况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合计	
	数量	覆盖案例比例	数量	覆盖案例比例	数量	覆盖案例比例	数量	覆盖案例比例
上级要求	13	43.33%	17	56.67%	15	50.00%	45	50.00%
自身建设	27	90.00%	25	83.33%	24	80.00%	76	84.44%
外部环境	3	10.00%	15	50.00%	15	50.00%	33	36.67%

注:对案例文本中涉及的每个动因记一个频次,同一文本可能有多个动因。

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等，对基层党建作出具体部署,各基层党组织因地制宜开展了探索。

2.“自身建设”动因分析。问题倒逼是改革创新的内生性因素。90 个最佳案例中,有 76 个案例创新动力源于自身建设,即 84.44%的创新案例都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例如,针对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问题,天津市静海县提出“五建五强”,全面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着力提高基层党组织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的能力和水平。针对干部作风不严不实问题,洛阳市老城区以“负面清单”管理催生正能量。针对城市各领域党建工作“步调不一、参差不齐”的现象,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以城市基层“全域党建”引领基层善治,推动“多元主体”的融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可见,基层党建创新大多是针对特定问题而进行的。

3.“外部环境”动因分析。近些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日益发达,既对基层党建工作提出挑战,也为基层党建创新发展创造了场景,提供了机遇。通过文本分析可见,90 个最佳案例中有 33 个涉及外部环境动因,占比 36.67%,并且从第三到第五届有上升的趋势。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运用为基层党建提供了技术支撑,依托数字赋能开展基层党建创新,成果正在不断涌现。例如,上海市黄浦区树立“大数据”理念,构建“社区治理数据库”,推动信息技术和城区发展全面深入融合。江苏省昆山市构建党建信息化管理系统,提升党建工作质效。回应群众诉求、扩大政治认同也是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考量。例如，上海市浦东新区沪东新村街道社区党建服务中心搭建“微心愿”平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通过认领居民微心愿,托起社会治理“大平台”。武汉市新洲区全面推行“直评村官”实践,动因就在于实现村民广泛参与、监督村务,满足村民诉求。

(二)创新绩效

经过对最佳案例的分析，大致可以将案例所涉及的创新绩效分为制度完善、机制创新、队伍建设等内部绩效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群众满意度等外部绩效两大方面,共 14 个绩效点。为便于量化分析，对最佳案例文本中的每个绩效点记一个频次,同一案例文本可能有多个绩效点。

1.内部绩效分析。总体来看,内部绩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度机制完善和理念更新。理念更新是创新的先导，制度机制完善是推进工作的基础。例如,青岛市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创新案例中研究出台了《干部网络学院章程》《青岛市干部教育培训学分制管理暂行办法》《青岛市干部在线学习管理暂行办法》等 6 个配套制度。福建省福清市推进支部星级创建，探索提高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加强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二是干部队伍建设和硬件改善。基层党建创新绩效直接体现在党建工作支撑条件的改善和提高上,其中以干部队伍建设、硬件改善最为明显。例如,陕西凤县实施村干部队伍建设“六化”工程,干部队伍活力竞相迸发。山东省青州市搭建线上服务平台,建设线下服务中心,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三是服务能力增强和工作效能提升。基层党建创新内部绩效最终体现在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增强和工作效能提升上。例如,深圳市罗湖区通过构筑卫生健康“党建联盟”,全面提升制度执行力和基层组织力,引领推动医改走向深入。

2.外部绩效分析。外部绩效也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例如,贵州省江口县

表 7 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的绩效情况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合计
内部绩效	制度完善	10	6	1	17
	机制创新	20	16	17	53
	队伍建设	13	10	6	29
	理念更新	2	1	3	6
	服务能力增强	18	6	11	35
	硬件改善	3	1	0	4
	工作效能提升	15	22	20	57
外部绩效	促进经济发展	8	8	10	26
	促进社会治理	10	7	8	25
	群众满意度提升	2	11	11	24
	上级肯定	10	10	14	34
	媒体报道	10	7	1	18
	经验得到推广	6	4	3	13
	行业影响力提升及其他	2	0	1	3

以“民心党建+组委会”治理模式,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浙江省嘉兴市探索“96345”党员志愿服务模式,推进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提升群众满意度。贵州省仁怀市推进“党员创业带富工程”,得到群众的充分认可和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仁怀经验”成为其党建名片。河南省焦作市以综合党建助推乡村振兴,切实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点赞。三是媒体报道、经验得到推广和行业影响力的提升。创新案例通过媒体报道、行业推广等形式发挥出强大的正向溢出效应。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小个专”党建“234 工作法”被《中国组织人事报》《中国改革报》《中国工商报》等媒体报道。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探索以“开放式党建”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取得良好效果,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学习其经验做法。

参考文献:

[1] 王长江.当前推进基层党建理论与实践创新亟待探讨的几个问题[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1):36-39.

[2] 王芳.人民立场视角下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研究[J].求实,2018(4):20-28.

[3] 张书林.新时代基层党建创新:困境与路向[J].理论探讨,2018(1):134-140.

[4] 刘 洁,王雯姝.新时代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多维度论析[J].理论视野,2022(3):91-96.

[5] 温丙存.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基于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的经验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2021(6):97-104.

[6] 杜鹏. 迈向治理的基层党建创新:路径与机制 [J]. 社会主义研究,2019 (5):112-119.

[7] 刘笑言,于美美.融媒体与我国城市基层党建的空间拓展[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27-136.

[8] 黄泺,陈玉书.新时代高校“智慧党建”系统实践创新研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18):41-42.

[9] 李洪涛,吴其林. 运用微信开展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模式创新探索 [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7):135-137 .

[10] 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EB/OL].(2022-06-29)[2022-11-10].https://12371.cn/2022/06/29/ARTI1656486783270447.shtml.

责任编辑:马俊

安徽省科技创新环境评价研究

——基于与江浙沪的比较

汪晓梦

（合肥市委党校，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科技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优质的科技创新环境是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提升的重要保障。在借鉴相关研究文献和结合安徽省科技创新实践的基础上，构建科技创新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基于安徽省科技创新环境的面板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度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对科技创新环境进行了纵向评价与纵向比较。研究表明：安徽省GDP、财政预算收入、固定资产、民用汽车数、移动电话数、互联网用户数、创新资源在科技产出中发挥的效用相对较低，江浙沪科技创新环境总体优于安徽省。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促进科技经济协同发展、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高效配置科技创新资源和建立创新环境评价机制体制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科技创新环境　灰色关联度　主成分　安徽省

一、问题提出与相关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安徽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指出，到2025年，安徽区域创新能力始终保持全国第一方阵并要争先进位，初步建成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安徽省坚定不移实施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推安徽经济社会更高质量发展。为此，开展科技创新环境评价与比较，找到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环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激发创新要素活力，吸引高素质人才，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优势，为全面提升安徽自主创新提供重要支撑。

（二）相关研究

自从欧洲创新环境研究小组（GREMI）提出创新环境的概念后，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界定创新环境的概念，并围绕科技创新环境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仍未达成共识。研究内容主要是探讨科技创新环境的影响因素维度，基本观点是科技创新环境的营造主要有政府政策支持、积极的物质投入和相应的激励制度等。国内专家学者对科技创新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1.定性研究。定性研究主要体现在关于科技创新环境的基础理论、内涵界定、现实意义、分类分析等方面的论述。孙静系统梳理了国际化科技创新环境研究的理论脉络和变化历程[1]。武正戈从科技创新环境的视角，分析了山西省科技报告服

基金项目：2022年度安徽省党校系统重点课题“安徽省科技创新环境评价实证研究”（立项编号：QS2022015）。
收稿日期：2022-11-20
作者简介：汪晓梦，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现代科技与文化教研部教授。

务系统的数据和研究报告的质量[2]。鲍晓晔、奚润禾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上海市科创企业对政策措施的满意度、获得感和制度需求[3]。李忠华、王鼎文运用理论分析、经验分析、归纳分析等方法，评价了沈阳市科技创新环境[4]。杨玉东、武碧璇通过统计图表，对中部地区科技创新环境进行具体分析[5]。妮莎论述了西部地区科技创新环境[6]。隗金成从把握不同环境要素在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关联、生成发展消逝的过程等方面入手，对科技创新环境进行系统的、综合的、动态的考察与分析[7]。沈鹏远认为科技创新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政策环境、服务环境、融资环境、孵化环境、人文环境和法制环境等[8]。

2.定量研究。定量研究主要体现了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维度和计量分析方法的选择。邵舒扬、郝莉娜构建了一个包括创新资源投入、中介转化等在内的多环节科技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山西省科技创新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科技创新环境进行了评价分析[9]。袁丹、王玲玲构建包括基础设施、创新资源、经济市场、政策法制、社会文化的科技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AHP）与熵值法，对湖北省科技创新环境进行研究[10]。张美琪构建由基础设施、创新资源、社会文化、政策法规环境的科技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了主成分方法对内蒙古兴安盟科技创新环境优化问题进行研究[11]。邓凯甄选高校科技创新环境所包含的要素，构建科学、公正的指标评价体系，找出制约高校科技创新发展的阻碍因素[12]。孙晓萌构建科技创新环境评价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定量分析影响大连市科技创新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13]。张世晓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科技创新环境对科技创新产出成果有显著影响[14]。

综上，关于科技创新环境评价的文献囿于“三重三轻”：一是重定性研究，轻定量分析。国内相关文献定性研究居多，主要讨论评价的理论基础、意义、特点、路径和方法。定量分析文献不是很多，尚处于不断创新进程中。二是重模仿国外，轻国内探索。大多数学者借鉴国外文献中的科技创新环境评价指标及其复杂的数理分析方法，较少探讨具有我国区域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和适宜的计量分析方法。三是重纵向比较，轻横向比较。大多数定量研究仅采用面板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纵向分析，而横向比较评价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拟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构建符合安徽省情的科技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集原始数据，通过灰色关联度和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评价，并与江浙沪的科技创新环境进行比较。通过纵向与横向比较分析，基于安徽省科技创新实践，提出更具有操作性的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对策建议。

二、变量设计与数据处理

（一）变量设计

在综合参考国内外科技创新环境评价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重要性、可比性和数据易获得性原则，构建包括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社会人文、创新资源、科技政策等环境 5 个一级指标、17 个二级指标的科技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表 1 所示。

（二）数据来源

本次分析数据来自安徽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2016–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 2017–2021 年三省一市的统计年鉴，极少数指标缺失的数据是通过年度增长率计算推导而来。原始数据对应的统计口径、度量单位、发布时间一致，确保计量分析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三）测算方法

1.灰色关联度。鉴于所研究对象具有“小样本、寡信息”特征，数据没有明显的数学概率及其分布特点，因而适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近似程度，从而判断序列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这种数据分析方法也不需要特定的统计分布检验，研究结论与事实基本吻合，因而此方法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15]55–57。

2.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方法主要是通过代数学中的正交变换原理，将描述研究对象或许存在相关关系的众多变量，在信息量损失较小的前提下，重新组合成维数不多且彼此线性无关又互补的新综合性随机变量[16]372–375。

（四）数据处理

使用 DPS 的灰色关联和 SPSS23.0 的因子分析程序对安徽省及江浙沪科技创新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的结果如表 2 和 3 所示。

三、比较分析与综合评价

（一）灰色关联分析

1.纵向分析

表 1　安徽省科技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代码	单位
经济发展环境	地区生产总值	X1	亿元
	财政预算收入	X2	亿元
	固定资产投入	X3	亿元
	出口额	X4	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X5	亿元
基础设施环境	公路里程数	X6	公里
	民用汽车拥有量	X7	万辆
	移动电话用户数	X8	个
	互联网用户数	X9	个
社会人文环境	高等院校数量	X10	所
	高等学校学生规模	X11	人
创新资源环境	R&D 人员	X12	人年
	R&D 经费	X13	亿元
	R&D 经费强度	X14	%
科技政策环境	专利授权量	X15	件
	技术市场成交额	X16	亿元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X17	万元

表 2　安徽及江浙沪科技创新环境灰色关联度

省份	安徽			江苏			浙江			上海		
指标名称	专利授权	技术成交	高新技术	专利授权	技术成交	高新技术	专利授权	技术成交	高新技术	专利授权	技术成交	高新技术
GDP	0.60	0.73	0.80	0.65	0.76	0.81	0.71	0.77	0.87	0.85	0.86	0.75
财政预算	0.58	0.64	0.72	0.72	0.83	0.94	0.70	0.75	0.80	0.74	0.78	0.78
固定资产	0.64	0.69	0.82	0.63	0.73	0.78	0.74	0.87	0.84	0.91	0.88	0.71
出口额	0.74	0.74	0.87	0.56	0.68	0.72	0.75	0.84	0.85	0.71	0.74	0.77
社会消费品额	0.80	0.89	0.71	0.47	0.50	0.53	0.63	0.66	0.82	0.74	0.76	0.78
公路里程	0.74	0.89	0.80	0.67	0.81	0.82	0.76	0.76	0.66	0.57	0.57	0.63
民用汽车	0.55	0.67	0.64	0.69	0.80	0.86	0.71	0.83	0.82	0.85	0.91	0.76
移动电话	0.58	0.67	0.82	0.59	0.70	0.73	0.66	0.70	0.71	0.66	0.58	0.64
互联网	0.58	0.66	0.74	0.65	0.76	0.82	0.51	0.49	0.50	0.77	0.87	0.72
高等学校	0.81	0.91	0.71	0.75	0.75	0.68	0.88	0.84	0.65	0.62	0.62	0.66
高校人数	0.73	0.87	0.68	0.60	0.68	0.72	0.84	0.90	0.67	0.95	0.83	0.63
R&D 人员	0.69	0.84	0.75	0.73	0.86	0.86	0.77	0.87	0.82	0.89	0.76	0.65
R&D 经费	0.69	0.76	0.95	0.73	0.80	0.90	0.76	0.87	0.85	0.84	0.90	0.76
R&D 经费强度	0.57	0.61	0.64	0.83	0.97	0.89	0.89	0.89	0.67	0.76	0.74	0.72

表 3　三省一市科技创新环境主成分分析

	2016 年		2020 年	
地　区	综合得分 F	综合得分 F 排序	综合得分 F	综合得分 F 排序
安徽省	−1.918	4	−1.684	4
上海市	−0.943	3	−1.153	3
江苏省	2.471	1	2.373	1
浙江省	0.390	2	0.464	2

(1)体量渐增性。2016–2020 年,安徽省科技创新环境与科技产出的指标原始数据的总量、年均增长量、平均增长速度都表现出逐年增加的显著特征。

(2)正向推动性。安徽省科技创新环境与科技产出的灰色关联度数值大小不一,且均为正数,隶属中度及以上相关性,表明安徽省科技创新环境在科技产出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正向推动作用。

(3)区间合理性。安徽省科技创新环境与科技产出的灰色关联度数值介于 0.45–0.95 之间,呈现正态分布规律。

(4)绩效差异性。安徽省科技创新环境与技术市场成交额的灰色关联度全部大于或等于科技创新环境与专利授权的灰色关联度,表明安徽省科技创新环境在技术市场成交额中发挥的作用优于专利授权。安徽省民用汽车数量与专利授权量的灰色相关性系数只有 0.55,最小,说明民用汽车数量对专利授权量的贡献率最低。安徽省 R&D 经费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灰色关联度高达 0.95,R&D 经费对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拉动作用最优。

2.横向比较

(1)经济发展环境。安徽省 GDP、财政预算收入与专利授权量灰色关联度,技术市场成交额、财政预算收入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灰色关联度数值都最低,效用落后于江浙沪。安徽省 GDP 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灰色关联度为 0.80,稍低于江苏省、浙江省,仅高于上海 0.05,安徽省 GDP 对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产生的效应排序第三。安徽省固定资产投入与专利授权量的灰色关联度为 0.64,与江苏省几乎相同,低于上海市、浙江省 0.27、0.10,安徽省固定资产投入对专利授权量拉动力位居第三。安徽省固定资产与技术市场成交额的灰色关联度仅为 0.69,最小,绩效末位。安徽省固定资产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灰色关联度为 0.82,为高度相关性,绩效稍逊于浙江省,位列第二。安徽省出口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科技产出中发挥的作用性总体不错,排名第一或第二位。

(2)基础设施环境。安徽省财政预算收入、民用汽车数与科技产出的灰色关联度数值和江浙沪相比,都是最小,绩效全部居于第四位。安徽省公路里程数与技术市场成交额、移动电话用户数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灰色关联度为 0.89、0.82,均为最大,效益最优,位居第一。安徽省公路里程数对专利授权量和互联网用户数对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效用性都是第二位,而互联网与专利授权量和技术市场成交额的灰色关联度数值都位列第三,其绩效相应也是排名第三位。

(3)社会人文环境。安徽省高等学校数与技术市场成交额、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灰色关联度为 0.91、0.71,高等学校数对技术市场成交额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效用在长三角均位列第一。安徽省高等学校数对专利授权量、高校人数对技术市场成交额的贡献率排序第二位。安徽省高校人数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灰色关联度虽仅为 0.68,但高于浙江省、上海市,低于江苏省,安徽省高校人数在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中发挥的作用名列第二。安徽省高校人数与专利授权量的灰色关联度低于上海市 0.22、浙江省 0.11,高于江苏省 0.13,安徽省高校人数对专利授权量的促进作用不及上海市、浙江省,领先江苏省,位居第三。

(4)创新资源环境。安徽省 R&D 经费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灰色关联度为 0.95,最大,属于强相关性,安徽省 R&D 经费对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导向性最强,位次第一。安徽省 R&D 人员与技术市场成交额、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灰色关联度为 0.84、0.75,R&D 人员对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产业化的推动力度,与江浙沪相比,均为第三位。安徽省 R&D 经费强度与科技产出的灰色关联度都比

较低,R&D 经费强度对科技产出的绩效均不理想,排名末位。

(二)主成分分析

1.低于均值。2016、2020 年安徽省科技创新环境主成分分析的综合得分为-1.918、-1.684,都是小于零,低于长三角总体平均水平。

2.位次不变。江浙沪 2016、2020 年主成分综合得分排序都没有变动,分别位居第一、第二、第三。安徽省始终排在第四,处于末位。

3.差距渐小。2016 年安徽省主成分综合得分低于江浙沪分别为 4.389、2.308 和 0.975,2020 年安徽省主成分综合得分低于江浙沪 4.057、2.148 和 0.531,得分差距在缩小。

4.正向跃迁。2020 年与 2016 年相比,皖江浙沪的主成分得分分别增加了 0.234,-0.098、0.074 和-0.210,安徽省与浙江省是正向跃迁,江苏省与上海市是负增长。安徽省增幅最高,位居第一,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增幅依次排序第二、第三和第四位。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安徽省科技创新环境发展与江浙沪客观上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差距在逐渐缩小并且处于不断优化的进程之中。

2. 在 42 个评价指标的灰色关联度横向比较中,安徽省有 8、9、8、17 个指标排序分别为第一、二、三、四位,排名靠后的指标较多。

3.通过主成分评价,江苏省科技创新环境最优,其次是浙江省、上海市,安徽省科技创新环境则位居第四,相对落后于江浙沪。

4.安徽省 GDP、财政预算收入、固定资产、民用汽车数、移动电话数、互联网用户数对科技创新产出贡献率偏低。安徽省的财政预算收入,民用汽车数、R&D 经费强度在科技产出中发挥的效用相对最弱。

(二)对策建议

1.促进科技经济协同发展。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经济发展实力也能决定科技创新发展的水平和能力,二者存在高度正向相关性。结合安徽省情,制定切实可行的科技成果转化“三就地”,即就地交易、就地转化、就地应用,从而实现科技创新价值最大化。随着经济发展实力的增强,优先增加科技创新财政预算,确保政府资金投入增速不低于经济总量增速,满足科技创新经费不断增长的需求。

2.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抓住新基建机遇,完善安徽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对科技创新至关重要。发展现代快速交通,不断缩短空间距离,扩大先进网络技术覆盖率,优化高水平信息化建设,有利于信息、资金、人才和技术等科技创新要素快速流向省内,吸引更多高层次创新人才来皖聚集,也能促进科技成果交易便捷化和高效化。

3.优化配置科技创新资源。科技创新资源涵盖资金、人才、项目和平台。增加政府财政预算,改变传统资金投入偏好,扩大资金覆盖率。激发科技创新主体活力,拓宽企业科技创新经费的自筹渠道,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注入科技创新活动。制定人才政策,引进创新人才和团队,形成稳定的创新队伍和研究力量。完善科技创新项目评估制度,促进政产学研金介的创新链不断优化。

4.建立创新环境评价机制。优越的科技创新环境有助于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与水平,科技创新环境评价逐渐得到学界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关注。借鉴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结合区域特色创新实践,科学设置科技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适当的定量评价方法,确保评价结果的合理性。同时,要综合考量科技创新环境评价的反馈结论,找到制约因素并进行原因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科技创新环境优化对策建议,实现科技创新环境评价工作的目的和价值。

参考文献:

[1] 孙静. 国际化科技创新环境研究评述[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1(19):10-12.

[2]武正戈.科技创新环境下的科技报告研究[J].科技创新与生产力,2021(5):4-7.

[3]鲍晓晔,奚润禾.通过问卷调研看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环境 [J]. 科技中国,2021(1):51-57.

[4]李忠华,王鼎文.优化沈阳科技创新环境的建议[J].经济研究导刊,2020(36):94-95.

[5]杨玉东,武碧璇.我国中部六省科技创新环境分析[J].今日财富,2020(8):213-214.

[6]妮莎.西部地区科技创新环境对德国在华投资影响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19(2):98-101.

[7]隗金成.民族复兴视阈下科技创新环境的培育与优化[C].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会议论文集,2017.

[8]沈鹏远.优化哈尔滨市科技创新环境对策研究 [J]. 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7(4):54-60.

[9]邵舒扬,郝莉娜.基于创新链的山西省科技创新环境评价研究[J].图书情报导刊,2022(7):66-74.

[10]袁丹,王玲玲.基于 AHP 和熵值法的湖北省科技创新环境评价研究 [J]. 科技和产业,2021(5):225-230.

[11]张美琪.内蒙古兴安盟科技创新环境优化问题研究[D].吉林财经大学,2021.

[12]邓凯."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陕西高校科技创新环境优化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8(6):86-92.

[13] 孙晓萌. 大连市科技创新环境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8.

[14]张世晓.基于互联网舆情的区域科技创新环境对科技创新产出的影响—以中国 19 个主要城市为例的实证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8(3):74-83.

[15]刘思峰.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16]陈胜可.SPSS 统计分析从入门到精通[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徐书琴

(上接第 9 页)

[7]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毛泽东文集:第 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毛泽东文集:第 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2]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1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M].北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21.

[14]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中国制度面对面[M].北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20.

[15]杜尚泽."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N].人民日报,2022-10-18.

[16]毛泽东文集:第 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7]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8]胡锦涛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0]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2] 习近平回信勉励外文出版社的外国专家,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交流沟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N].人民日报,2022-08-27.

[23]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J].求是,2022(1):4-15.

[24] 王玉堂. 习近平同志早期领导艺术初探——基于正定的实践 [J]. 秘书之友,2019(9):4-8.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马俊

安徽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及路径选择

陈华彬　陈再勤　孟超峰　胡峰

(宣城市委党校,安徽　宣城　242000)

[摘要]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是数字乡村建设。数字乡村建设体系总体架构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公共支撑平台、保障体系建设、数字应用场景等,建设目标是填平城乡数字鸿沟,加长乡村信息服务短板,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注入数字动能。安徽是全国较早探索数字乡村建设的省份之一,虽然打造了一批数字乡村典型应用场景,但是还存在规划政策体系不完备、发展协调机制不健全、网络信息基础设施保障不力、信息资源系统融合度不高、乡村信息化人才不足等问题,从建立规划政策体系、健全协调推进机制、完善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强化信息系统资源整合力度、注重乡村信息化人才培养等几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　数字乡村　农业农村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不但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而且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1]。

一、安徽省数字乡村建设基本情况

安徽是全国较早探索数字乡村建设的省份之一。2018 年 2 月安徽省委 1 号文件提出“加强数字乡村建设”[2]。2018 年 5 月《安徽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推动‘互联网+农村’建设,打造数字乡村”[3]。2020 年 6 月《“数字江淮”建设总体规划(2020-2025 年)》提出:“统筹发展数字乡村与智慧城市,推进乡村数字化转型”[4]。2021 年 2 月《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确定数字乡村建设的具体目标[5]。2021 年 6 月安徽省委网信办确定肥西县上派镇等 35 个地区为首批数字乡村试点单位,要求试点单位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建立试点工作台账,及时梳理和总结试点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6]。2022 年 4 月安徽省委网信办、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等 11 个部门制定了《安徽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推动信息化和乡村振兴有效融合,彰显大数据技术助推乡村振兴。

(一)数字乡村建设体系框架

数字乡村围绕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等方面,通过建设信息网络,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乡村数字经济、保护智慧绿色乡村、繁荣乡村网络文化、创新乡村数字治理,从而形成城乡一体的信息惠民服务体系,实现乡村振兴“20 字”总要求。根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乡村振兴视阈下安徽省数字乡村建设研究”(立项编号:2021CX107)。
收稿日期:2022-11-21

作者简介:陈华彬,中共宣城市委党校教授。陈再勤,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本科在读。孟超峰,宣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胡峰,宣城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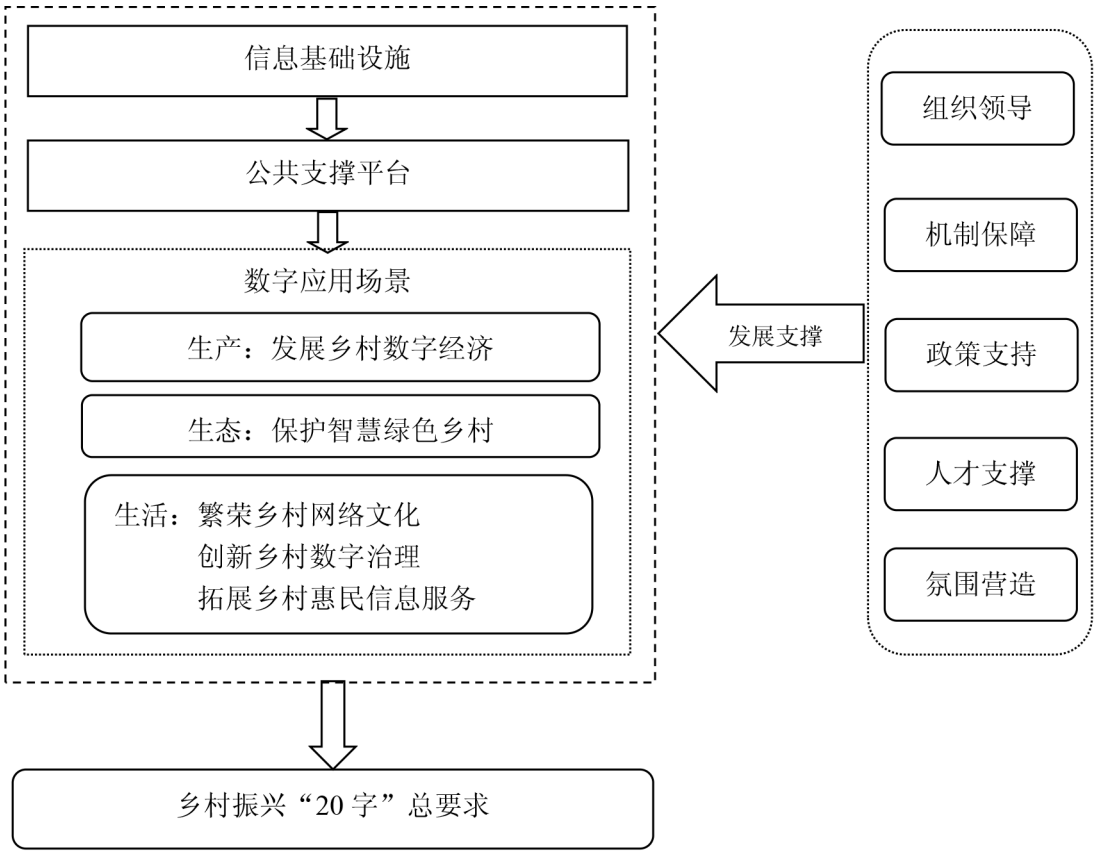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乡村建设体系框架

据《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的有关要求，结合各地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经验，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总体架构，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公共支撑平台、保障体系建设、数字应用场景等内容(如图1所示)。其中，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包括网络基础设施、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改造；公共支撑平台包括公共数据平台和各类应用支撑平台，是各类数字乡村应用的系统基础；保障体系包括组织领导、机制保障、政策支持、人才支撑、氛围营造等五个方面；数字应用场景描述围绕农村生产、生态、生活等领域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适用情景。

(二)数字乡村建设的典型场景

1.背景介绍

本文以首批安徽省数字乡村试点镇宁国市港口镇作为个案，分析宁国市港口镇数字乡村实践情况。港口镇位于宁国市北部，总面积97.1平方公里，总人口4.2万人，辖太平村、山门村、港口村、凉亭村、灰山村、西村村、五磁村等7个村，新村社区、港口社区2个社区。主导产业为建材、化工，先后获得全国特色小镇、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安徽省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安徽省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安徽省森林城镇、安徽省文明乡镇、安徽省首批健康小镇等荣誉。2021年6月，港口镇入选首批安徽省数字乡村试点镇。

2.主要做法

(1)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大力提升光纤网络支撑能力，对现有网络进行优化和升级，满足辖区村民对信息化的需求。同时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网络安全风险防范能力。

(2)培育电子商务新业态。加快“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步伐，配齐农产品加工、包装、仓储等设施。深化乡村邮政和快递网点普及，加快推进智慧物流配送中心建设。推进电商企业入驻淘宝、天猫等平台，同时积极在拼多多、微信社交、短视频、直播等平台上挖掘潜力，充分利用流量变现，带动电子商务发展。

(3)促进乡村文化发展。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公共文化普惠均衡发展，村(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全覆盖，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大力挖掘省级非遗文化，不断加大对皖南花鼓戏、龙窑制陶技艺等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4)开发“智慧党建”系统。依托“云计算+大数据+App”模式，深化党员教育、党员管理、党员反

映事项处置、党组织管理四大功能，为全镇 48 个基层党组织和 1515 名党员提供全方位服务。打造集视觉、听觉、触觉为一体的立体式党建 VR 云展厅，通过沉浸式、互动性的体验学习，让党员身临其境，体悟党的奋斗历程，为党员学习教育提供全新方向。

3.取得成效

(1)“雪亮工程”全覆盖。港口镇探索“政府+企业+家庭”三方共建共享模式，建成全镇联防联动指挥大厅，在全镇乡村道路、公共区域、重要节点安装 702 个“雪亮乡村”监控点，打造可视化监控调度网，实现乡村治理无死角、无遗漏。

(2)新媒体平台显功效。打造“千年港口”官方抖音号、今日头条号、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运营平台，对党建、招商引资、文化旅游、企业服务等进行全面宣传推广，目前 4 个官方新媒体号累计浏览量约 4.2 亿次，收到 3000 余条招商合作信息，帮助镇域企业招聘 1000 余人，“艺术西村”被评为安徽省文旅最具品牌潜力奖。

(3)办公实现“云桌面”。对全镇工作人员提供一种基于云计算存储技术的虚拟桌面服务（云桌面），工作人员可以突破时间、地点、终端、应用的限制，随时随地接入云端办公桌面，开通小鱼视频会议系统，提升工作效率。

二、安徽省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规划政策体系不完备

目前省、市、县三级还没有制定出台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数字乡村建设发展规划，也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安徽省数字乡村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等不够明确，各地普遍对数字乡村建设重视不够，不了解数字乡村的基本概念、重点内容，对怎样建设数字乡村更是一头雾水，更有甚者把数字乡村简单等同于农村电商。导致各地数字乡村建设工作呈条块分割状态，各类涉农信息应用系统仍处于封闭运行状态。安徽省 2021 年 2 月份启动数字乡村试点工作，6 月份公布 35 个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但是部分试点县、乡镇的工作还停留在完成申报层面，下一步如何推进数字乡村试点工作还处于观望状态。国内大多数省份已经出台数字乡村建设政策文件，比如，浙江、河北、江苏、山东、湖南、广东等 22 个省份相继出台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浙江还出台了《数字乡村建设“十四五”规划》。

(二)发展协调机制不健全

在中央和省级层面，由党委网信部门牵头抓总，而市级网信部门是最近一次机构改革新组建的党委工作部门，无论是职能设置还是人员力量配备都不能完全胜任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工作需要，无法很好履行牵头抓总、协调各方的职责，所以出现有的市把数字乡村建设有关工作文件批转给农业农村部门或数据资源部门来办理，造成市级网信办、农业农村部门、数据资源部门都管数字乡村而又很难管好的局面。县级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主战场，多数县级网信部门是作为宣传部的一个职能部门，主要负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由一个职能部门协调相关县直单位来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更是难上加难。另外，重点任务落实、保障措施、评价考核机制尚未建立，没有明确数字乡村建设中各级各部门的职责和任务分工，推进合力还没有形成。

(三)网络信息基础设施保障不力

一是网络基础设施施工难度大。乡镇管道资源有限，新建管道、新建基站及机房建设，存在审批流程长、环节多的问题，时间进度无法满足网络建设要求。同时乡村基站天线安装、基站及机房选址、杆路架设等受阻情况比较严重。少数群众及单位索要高额协调费、设备管理费和场租费，附近居民认为基站辐射会致癌，阻挠施工，影响工程建设。二是 5G 建设运营成本高。特别是 5G 基站设备耗电量大，是 4G 基站的 3–4 倍，5G 开通后年平均每个物理站点用电量增加约 50%、电费增加约 1 万元，加之网络覆盖半径的差异，5G 基站的后期维护成本，峰值情况下是 4G 基站的 10 倍左右，影响 5G 网络大规模建设。虽然 5G 能够极大地助力工业互联网、乡村数字经济等各行业的资源整合和效率提升，但目前大多数企业采用的是有线和工业 WIFI 网络，数字化水平参差不齐，很多企业还是传统老式设备，缺乏数字化模块，替换到 5G 网络，需要进行生产设备和系统优化改造，成本较高，导致很多企业 5G 应用意愿不强，持观望态度，行业应用难以落地。这就阻碍了农业信息应用、电子商务、“互联网+教育”及“互联网+医疗健康”在农村推广应用，也无法满足一些新型数字农业发展需求，比如，植保无人机、机器视觉类型新型农机对网络时延、可靠性、速率等性能的要求较高。

(四)信息资源系统融合度不高

一是信息孤岛依然存在。大多数部门都有一

套或多套平台系统,存在重复建设问题,信息平台难以串联起来。目前乡村应用较为普遍的益农信息社、村村享、政民通、云上社区等系统数据标准不统一,功能雷同,数据资源分散存储,集成应用不够,无法进行有效整合共享,部分信息数据采集工作主要依靠人工完成,数据不能做到及时更新,造成了资源浪费,增加成本投入,加重基层负担,降低信息化应用能力。二是平台融合难度大。在推动信息化平台系统整合时,系统开发公司之间存在竞争,标准之间存在差别,要么整合工作难推动,要么花"大钱"付接口费。面对开发公司"狮子大开口"的接口费报价,各地提到接口则"痛"。

(五)乡村信息化人才不足

乡(镇)、村两级党员干部知识结构、思维意识跟不上信息化发展速度,对信息化、大数据以及数字经济等知之不多,运用信息技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加快经济发展办法不多。乡村待遇较低、条件相对较差、发展机遇有限等因素导致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比例很高,留在乡村的老人、妇女对现代通信信息技术了解很少,信息化意识和利用信息能力不强,互联网带动农民创业创新的氛围还没有形成,严重阻碍农业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互联网+"现代农业建设的进度。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信息化重要性认识不够,很少有既懂信息技术又懂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人才。以电子商务为例,电商运营管理、美工等高级人才短缺,存在难培养人、难引进人、难留住人现象,一些电商企业只能采取服务外包的方式解决美工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了解基层卫生院(室)机构运行、熟悉公共卫生服务、掌握计算机及相关网络知识的管理实用型人才较少,比如,旌德县10个镇卫生院、58个村卫生室均无信息化专业人员,基层信息化应用与保障能力不足。

三、推进安徽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建议

(一)建立规划政策体系

一是完善省级层面数字乡村建设规划政策体系。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建设,以系统化的思维设计建设架构,出台省级层面《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的实施方案,明确全省数字乡村建设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为安徽省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提供重要指导。高水平谋划数字乡村建设规划,编制全省数字乡村建设"十四五"规划,明确数字乡村建设背景、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省级层面每年印发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明确当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二是健全市、县级层面数字乡村建设规划政策体系。各市统筹制定市级数字乡村建设规划。各县(市、区)在市级规划的基础上,根据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现状编制有自己特色和重点的子规划。重点能够提供党建服务、便民服务、应急服务、特色乡村服务、农产品销售、文旅结合等相关应用场景,提升乡村综合治理、乡村经济发展等方面信息化服务能力。形成总分结合,长短结合,省、市、县三级协调联动的数字乡村建设规划政策体系。

(二)健全协调推进机制

一是健全数字乡村建设统筹协调和议事决策机制。成立省、市、县三级数字乡村建设领导协调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明确网络信息、数据资源、农业农村、乡村振兴等部门职责分工,加强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形成工作合力,科学构建指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和评价体系,完善配套措施,抓好组织推动,积极开展数字乡村试点工作,总结全省首批35个数字乡村试点地区的做法和经验并在全省推广,通过试点示范,推进数字乡村建设。适时召开全省数字乡村建设专题会议,采取政策宣讲、现场观摩、案例研讨等形式进行全面动员部署。二是建立数字乡村建设激励考核机制。设立"数字乡村"建设专项奖励基金,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和人才参与乡村数字产业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拓展服务范围;构建数字乡村建设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奖惩激励机制,强化监督指导,防止数字乡村建设工作中出现一哄而上或停滞不前等情况。

(三)完善网络信息基础设施

一是加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的协调联动。坚持网络、信息、物流与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避免重复规划建设。通过招商方式引入国内主流服务商(三大运营商、各硬件/软件集成商)和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乡村网络接入设备更新、线路改造和服务升级,全面优化农村网络接入能力和速率。二是加快5G推广应用。为保障5G连续覆盖,实现互联互通,要开放城乡公共区域,降低基站选址难度,保障选址位置合理性。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广泛宣传5G在提供增长新动能、提升生活品质等方面的意义,切实加强电磁辐射知识科普教育,消除群众对基站建设的误解,减少建站阻挠。5G运营成本远高于

4G,其中电费占了极大的比重。比如,宣城移动公司基站直供电价格约为0.62元/度,转供电价格普遍在0.8元~1.2元/度,5G基站单站点用电平均约4.5万度/年,平均一个5G基站单站点转供电一年电费就需要耗费4万元左右。目前已有地方政府下文明确优惠电价支持5G发展，如山西省政府出台5G基站电价补贴政策，安徽省当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当涂县加快推进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当政办秘〔2020〕40号)，明确对通信设施转供电价格最高限价为0.7元/度。建议市、县、乡三级政府在统筹规划的情况下,出台类似扶持政策,既帮助基础电信运营企业降低负担，也有利于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向上级公司争取5G资源,力争乡村重点区域和医疗、教育、农场、电商等重点领域尽快享受5G红利。

(四)强化信息系统资源整合力度

一是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信息系统的生命力在于集约化程度，系统融合数据越多生命力越强。在提升网络信息安全防护能力的基础上,不断健全信息分级别、分权限的整合共享和信息安全保障制度，依托电子政务外网和大数据共享交换体系,依法有序推动农业农村、水利、交通、公安、民政、人社等各部门数据互联互通、整合共享,消除“数字孤岛”,依托大数据平台实现涉农数据资源协同管理和在线共享。二是重点建设乡村数字化综合管理平台。整合安徽政务服务网各县分厅、“互联网+监管”、“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文旅”、“互联网+党建”、农村综合信息服务网、农村雪亮工程等各平台,通过电脑端、移动端、窗口端、自助端、电视端等“五端”提供全覆盖、精准化、个性化、智慧化服务,要在“智慧城市”建设中预留乡村数字化综合管理平台端口,实现“平台化零为整,载体化繁为简,用户化少为多”。三是明确信息化平台接口规范。其主要包括接口标准、价格、工作实效、验收条件等,同时行业主管部门要对平台系统开发公司有效履行监管职能，对于工作效率低、售后服务差、接口费漫天要价的公司降低诚信评分，对于诚信评分低的公司纳入省内黑名单不允许参加项目建设。

(五)注重乡村信息化人才培养

一是开展面向农民的信息技能培训。充分利用农民夜校、益农信息社等软硬件设施,通过集中培训、网络电话咨询服务、现场指导等多种方式开展针对农民的信息技能培训,推动“互联网+新型职业农民”深度融合发展。把乡村数字产业技术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范围,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数字化技能知识培训，逐步提升农民数字化水平和应用能力。同时还应注意提高农民个人信息的自我保护意识,加强网络巡查,严控乡村网络有害信息。二是提升基层干部信息技能。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但是需要基层干部有效引导。充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大学生、科技特派员的群体作用，注重提升以村党组织书记为首的村“两委”干部的信息素养,彰显基层干部信息技能引领作用。三是开展电商从业人员专项培训。支持乡村领办、村集体经济创办、乡村振兴工作队参与,示范带动农村电商发展,开展以商引才,通过电商龙头企业，吸引更多的电商人才和企业扎根乡村创新创业。四是“招才引智”,建立健全与高校院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机制,在住房、养老、子女教育方面给数字乡村建设所需人才提供便利,助力长三角数字乡村人才互通互融。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N].农民日报,2019-05-17.

[2]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EB/OL].(2018-05-18)[2022-07-06].https://www.ah.gov.cn/public/1681/7926901.html.

[3] 安徽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EB/OL].(2021-10-25)[2022-07-06].https://www.huainan.gov.cn/public/118319877/1258858791.html.

[4]“数字江淮”建设总体规划(2020-2025年)[EB/OL].(2021-06-04)[2022-07-06].https://www.ah.gov.cn/public/1681/554074941.html.

[5]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2021-04-21)[2022-07-06].https://www.ah.gov.cn/public/1681/553978211.html.

[6] 首批安徽省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公布[EB/OL].(2021-06-30)[2022-07-06].http://www.ahwx.gov.cn/xxhjs/202106/t20210630_5340245.html.

责任编辑:徐书琴

合肥市推进林长制改革的主要做法及提升策略

王永龙 夏琦 尹俊 朱梦姗

(合肥市委党校,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 林长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2017年,合肥市率先推行林长制。主要做法是:坚持党建引领,着力强化组织保障;坚持制度建设,持续提升履职实效;坚持示范创新,不断增强改革动能;坚持“五绿”并进,有序推动提质增效;坚持项目推进,着力提升改革成效。当前,合肥市林长制工作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比如对林长制的认识尚需深化、林权改革亟待加快等。下一步,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坚持系统观念,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深入实施“五大森林行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助力打造“生态名城”。

[关键词]合肥 林长制改革 保护 发展 “五大森林行动”

林长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也是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合肥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中办、国办《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以及安徽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从作为安徽省林长制改革“先行试点市”到积极参与“安徽省创建全国林长制改革示范区”建设,在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中勇当全省示范，奋力打造“绿色之都”“生态名城”,改革成效明显,为安徽省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努力探索合肥模式。

一、主要做法

2017年3月以来,作为安徽省率先推行林长制的试点城市之一,合肥市持续深化林长制改革,扎实推进林业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党建引领,着力强化组织保障

合肥市坚持林长制+党建协同推进模式,以党建引领林长制改革体系建设。一是构建组织体系。建立健全以责任制为核心的四级林长体系，实现市、县、乡、村四级林长制工作全覆盖。二是构建责任体系。明确四级林长责任。市主要领导督导谋划,分管领导调度推进,以上率下,向基层拓展延伸。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包括会议调度机制、投入保障机制、工作督查机制、考核问责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确保林长制改革上下畅通、运转高效。

(二)坚持制度建设,持续提升履职实效

合肥市坚持把制度建设作为林长制的重要保障,着力推进林长制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一是建立市级总林长令制度,以令促行,推动各级林长履职尽责。二是健全日常工作制度。制定市级林长

基金项目: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2022年度科研课题“合肥市‘林长制’工作提升策略研究”(立项编号:HFDXKT202208)。

收稿日期:2022-11-11

作者简介:王永龙、夏琦,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尹俊,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朱梦姗,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讲师。

会议、项目调度、督查巡查、技术服务、信息公开等制度，出台《关于推深做实林长制改革加快实施“五绿”工程的意见》，保障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三是完善考评制度。率先出台《合肥市林长履责考评办法》，实施分类考核；积极推进各级林长履职公示公开，推动责任落实落细。

（三）坚持示范创新，不断增强改革动能

合肥市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高质量推进林长制改革。一是深入推进林长制改革示范区建设。突出抓好环巢湖地区、肥西县等省、市级林长制改革示范先行区建设，打造江淮运河生态廊道。二是加强平台建设。着力将各类国家级、省级林业园林重大展会打造成展示合肥市林长制改革成果的重要窗口。第14届园博会筹办工作有序推进；国家苗木信息交易中心信息平台和交易平台开通运营。三是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建立健全环巢湖十大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和公益林生态补偿机制，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换。

（四）坚持“五绿”并进，有序推动提质增效

合肥市坚持以安徽省提出的“五大森林行动”推动“五绿”并进，着力提升生态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一是精细化管理资源。建立合肥市绿地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平台，助力资源有效保护和建设项目引进。二是科学合理划定绿化用地，落实植树造林行动，有序改造退化林，打造“退耕还林升级版示范市”。三是推动“用绿”造福于民。强化林业科技创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做优苗木花卉、森林旅游等产业品牌。制定实施林业奖补政策，促进林下经济富民增收。四是优化林业发展环境。有序推进林地流转。积极落实“五绿兴林·劝耕贷”和公益林全部投保，发放林业抵押贷款。

（五）坚持项目推进，着力提升改革成效

合肥市坚持以项目为抓手，扎实推进林长制改革落地见效，获得国家林草局认可和多次赞许。一是聚焦项目谋划。紧密结合国家及省市规划，精选优化林长制项目。在国家及省级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城市大型绿地等重要生态区域谋定林长制重点项目。二是聚焦项目推进。坚持规划引领，高标准编制《合肥市林长制实施规划》《合肥市林长制重点项目实施规划》，编制年度林长制项目任务清单。三是聚焦巡林调度。市级总林长亲自推动林长制改革示范区建设、城市“十大公园”、骆岗生态公园建设以及杨树飘絮治理等工作。县（市）区级林长督导督查，协调解决焦点难点问题。

目前，合肥市正在构建系统高效的林长制，聚焦履职尽责的林长(zhǎng)治，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林长(cháng)治，促进生态治理现代化。环巢湖十大湿地保护修复、统筹城乡绿色融合发展等工作获得安徽省领导批示肯定。当然，目前合肥市林长制工作仍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对“林长制”的认识尚需深化、林权改革亟待加快、林业综合效益有待提高等。

二、提升策略

林长制是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以“林”为主题，以“长”为关键，以“制”为保障，坚持党政同责、部门联动，强化责任担当，层层压实责任，通过促进林业保护与经济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合肥市应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理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积极巩固林长制改革创新成果，深入实施“五大森林行动”，在新一轮林长制改革中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

（一）深入实施平安森林行动

一是乡（镇）、村（社区）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切实提高广大群众对林长制改革的知晓率，让群众理解支持林长制改革；以群众监督、各级抽查等形式落实“一林一员”网格化管护，维护林业安全。二是抓紧制定《合肥市实施林长制条例》。《安庆市实施林长制条例》已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2021年7月1日，《安徽省林长制条例》正式施行。作为省会城市又是示范区先行区，合肥市应尽快制定《合肥市实施林长制条例》，为深化林长制改革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三是尽快完善“一林一警”中的行政执法功能。建议合肥市积极吸收肥西县林业执法大队和长丰县林政科执法成功经验，统筹建立县（市）区林业行政执法机构和队伍，创新合肥林长制执法模式。

（二）深入实施健康森林行动

一是科学规划下派造林任务。合肥林业部门要依据省市自然资源与规划部门的土地绿化基础数据，结合国土绿化和长远发展情况，科学规划下派造林任务，避免盲目发展。二是大力实施县（市）区公益林保育、退化林修复等工程，精准提升森林质量。优先解决杨树老化影响农民收入问题。三是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建设“共建林”，（下转第35页）

长三角地区旅游消费潜力释放机制与路径研究

武优勐　匡祖欣　杨丽姣

（安徽工业大学，安徽　马鞍山　243002）

[摘要]旅游消费潜力的释放是促进消费有序恢复发展、扩大内需的一项重要举措。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长三角的旅游消费呈现市场疲软、中青年成为消费主力军、周边游和乡村游成为主流方式、线上旅游消费需求上升等特点。扩大居民旅游消费需求，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旅游产品和服务供需匹配，是释放旅游消费潜力的重要机制。在疫情冲击下，长三角旅游消费潜力的释放存在消费信心不足、消费需求疲软，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消费环境亟待优化，旅游管理服务智能化滞后、消费便捷度较低等制约因素。为推动长三角旅游消费潜力释放提质增速，应开展“本地人游本地”惠民活动、构建全龄化研学旅游体系、组织景区网络营销赛事、实施智慧旅游升级工程、创新旅游保险服务产品、完善新型旅游设施体系。

[关键词]长三角地区　旅游消费　潜力释放　机制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有效释放消费潜力，是促进强大国内市场形成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1]。疫情深刻改变了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影响了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对新阶段释放消费潜力提出了新的要求。2022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指出，应对疫情影响，促进消费有序恢复发展。疫情过后，旅游无疑是最能释放消费潜力的领域之一，扩大旅游消费成为推动经济稳定复苏的重要途径。

旅游消费是消费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内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是彰显消费信心的晴雨表[2]。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旅游消费对拉动内需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这对于夯实国民经济发展基础，提高内外双循环发展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4]。近年来，新冠疫情已蔓延到全球，导致世界经济低迷，贸易指数急剧下降[5]。相比较而言，由于旅游业高度依赖人员流动，旅游消费的复苏将需要更长的时间[6]。同时，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旅游消费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应急反应特征，旅游消费习惯与方式随之发生变化。值得关注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催生了旅游业发展新模式和新业态，为旅游消费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长三角区域居民文化消费增长动力机制研究”（立项编号：AHSKQ2020D66）。

收稿日期：2022-11-16

作者简介：武优勐，安徽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匡祖欣，安徽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杨丽姣，广东金融学院讲师。

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使全国旅游业受到巨大冲击，各地旅游消费市场持续疲软[7]。近期疫情虽有所好转，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依然很大，旅游消费复苏较为缓慢。基于此，须审视长三角地区旅游消费的特点，厘清旅游消费潜力释放的机制，分析旅游消费潜力释放的制约因素并提出旅游消费潜力的释放路径。

一、长三角地区旅游消费的特点

(一)旅游消费市场疲软

受新冠疫情影响，居民旅游消费能力下降，旅游消费市场疲软。据各省市数据测算，2020 年长三角地区国内旅游人数为 174804.62 万人次，旅游消费为 23431.31 亿元；2021 年长三角地区国内旅游人数为 198391.21 万人次，旅游消费为 26879.73 亿元。据旅游消费与 GDP 关系模型测算，2020 年长三角地区旅游潜力约为 15742 亿元，2021 年长三角地区旅游潜力约为 18833 亿元(见图 1)。当前疫情防控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旅游消费复苏依然缓慢。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数据显示，2022 年“五一”期间，国内游客总数达到 1.6 亿，同比下降 30.2%，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 66.8%；实现国内旅游消费 646.8 亿元，同比下降 42.9%，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 44.0%。

(二)中青年成为旅游消费主力军

中青年人对信息的接收和探索能力较强，能够利用信息快速做出反应，积极改变旅游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以适应疫情防控形势，成为主力消费群体。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内旅游发展年度报告 2022》显示，2019 年，我国旅游消费群体以 25–34 岁的青年人为主，占游客总量的 30.3%；25–44 岁的中青年游客在国内游客中占 52.2%。据携程统计，2021 年“五一”期间出行人数中，“90 后”占比达 37%，成为绝对出游主力，其次是“80 后”，占比达 27%。此外，《长三角青年消费大数据报告 2022》指出，从长三角地区文旅消费的复苏情况来看，青年文旅消费恢复较快，其消费总量在 2021 年上半年即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三)周边游和乡村游成为主流方式

当前，旅游者特别关注健康和安全，周边游和短途游成为首选。江苏省文旅厅发布的《2021 年江苏省旅行社行业发展报告》显示，从江苏省接待人数来看，省内游客占比约 60%，苏浙沪地区总占比高达 98%。此外，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1 年国庆假期的旅游数据统计报告》显示，国内游客的出行距离和游憩半径均呈现收缩态势。其中，平均出行半径为 141.3 公里，同比缩减 33.66%；平均游憩半径为 13.1 公里，同比缩减 7.75%。同时，乡村游也成为国内游客出游的热点之一。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1 国庆旅游市场数据报告》显示，大约 50%的游客在假期前往城市郊区和周边乡村，这一比例远高于城市公园、人文景区，不同年龄群体的游览区域偏好也较为相似(见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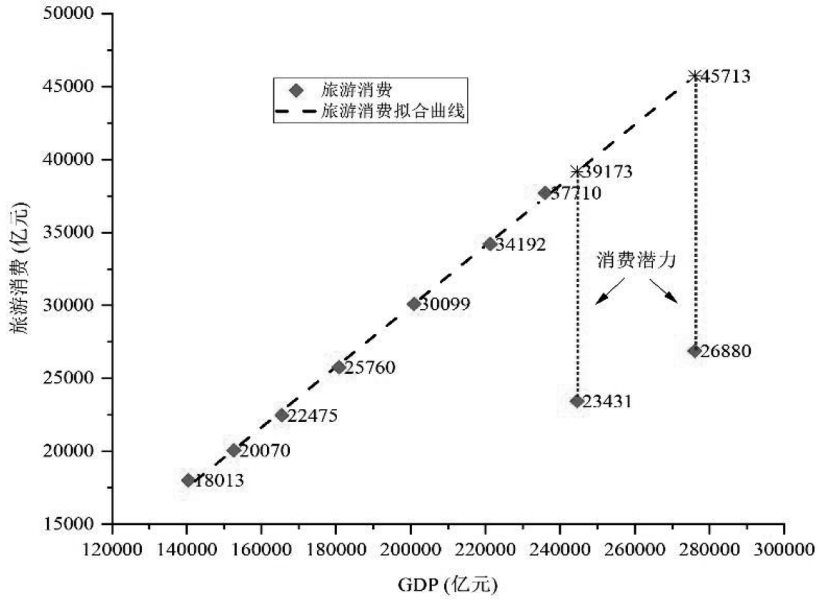

图 1　2013–2021 年长三角 GDP 与旅游消费①

表 1　不同年龄群体的游览区域偏好

年龄段	山林水草景区	城郊乡村	城市公园	人文景区
25 岁以下	29.60%	43.00%	12.90%	12.70%
26–35 岁	26.30%	53.80%	11.50%	8.00%
36–45 岁	21.80%	57.40%	13.00%	7.40%
45–60 岁	14.80%	63.80%	12.40%	7.40%
60 岁以上	3.70%	62.90%	29.60%	3.70%

(四)线上旅游消费需求上升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信息技术从多个方面赋能旅游消费，使旅游消费逐步向数字化、虚拟化方向转变。例如旅游景区与数字娱乐场景的结合，为游客提供了更多的旅游产品，为“足不出户去旅行”开拓了新的消费空间，满足了线上旅游消费需求。商务大数据对重点电商平台监测数据显示，2021 年“五一”期间，国内线上旅游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526.3%，其中景点门票销售额同比增长 300.7%。极数发布的《2021 中国在线旅游行业报告》显示，2021 年国内线上旅游交易总额达 1.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34.9%，占国内旅游总收入的 50.34%。从热门产品来看，抖音策划的“抖音春光正当时”活动，累计曝光超过 100 亿次；微博推出的“城市寻游记”旅游推广活动频繁登上热搜。

二、长三角地区旅游消费潜力释放的机制分析

旅游消费潜力的释放需要在适当环境下实现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供需匹配，促进潜在旅游消费需求转变为现实旅游消费需求。具体来看，旅游消费潜力的释放机制可概括为：扩大旅游消费需求；优化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旅游产品和服务供需匹配。

(一)扩大旅游消费需求

扩大旅游消费需求要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居民消费意愿为前提条件。第一，增强旅游消费能力。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居民消费增加离不开收入的增长。充分激发重点群体增收活力，促进稳定就业，改善工资收入预期，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切实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的重要保障。第二，提升旅游消费意愿。购买欲望是把消费者潜在购买力转变为现实购买力的重要条件。当前，旅游消费复苏乏力，这和消费者意愿不强有一定关系。一般而言，改善旅游消费者的未来预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旅游消费意愿的重要途径，也是激发即期旅游消费的重要因素。

(二)优化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

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优化包括供给数量的增加、质量的提高、结构的优化和环境的改善，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是扩大旅游消费的基础。第一，增加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数量。绝对数量的提升使得消费者的消费欲望能够随时随地得到满足；人均旅游资源的增长会提高旅游对消费者的吸引力。第二，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决定了消费者的体验感和满意度，能刺激潜在消费转变为现实消费。第三，促进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结构优化。基于消费者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闲暇时间等因素的差异，考虑消费者对旅游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具有异质性，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结构要合理。第四，改善旅游消费环境。优良的环境是现代旅游系统的生命线。旅游市场创建放心的消费环境，不仅可以使社会资源进一步优化，在制度层面上确保旅游资源不被践踏和破坏；还能使得区域空间更加宜居宜游，降低旅游消费行为的交易成本，消除现实的消费障碍，提升消费信心，刺激消费欲望。

(三)促进旅游产品和服务供需匹配

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供需匹配体现在数量、类型、质量和信息等方面。第一，数量上的供需匹配是扩大旅游消费的基本条件。一方面，数量供给不足会造成消费拥挤；另一方面，供给过剩会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在数量上要动态满足消费者旅游需求的调整，实现各地区旅游资源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平衡。第二，旅游消费类型上的供需匹配是扩大旅游消费的重要条件。按照旅游资源种类划分，旅游消费分为自然风景、人文历史、体育、购物等类型。按照目的地与消

费者距离划分,旅游消费分为短距离、中距离和远距离旅游。消费者根据时间、预算和偏好等条件选择不同的旅游类型，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需要尽量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这样才能对旅游消费扩大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三,旅游消费质量上的供需匹配是激发旅游消费潜力的有效途径。随着居民消费不断升级,人们对旅游等发展和享受型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同时对其消费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据此,需要不断适应消费升级的节奏,努力提高旅游消费者的满意度。第四,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信息有效传递是激发旅游消费潜力不可或缺的条件。当前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只有将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特色、优势等信息有效传递给消费者,才能激发其旅游消费意愿。

三、长三角地区旅游消费潜力释放的制约因素

(一)旅游消费信心不足,消费需求疲软

伴随着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疫情防控逐步常态化，多省面临疫情冲击和疫后旅游消费需求疲软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受疫情影响,多地调整出行防疫政策,“48 小时核酸”已成为标配,消费者出游会更加谨慎。另一方面,疫情之下,减薪、失业、企业倒闭等事件频发,严重影响消费者对未来发展的预期,致使消费需求不振。据统计部门数据测算,浙江省 2020 年国内旅游人均旅游消费支出为 1724.74 元,同比下降 2.14%;安徽省 2020 年国内旅游人均旅游消费支出为 897.30 元,同比下降 11.31%；上海市 2020 年国内旅游人均旅游消费支出为 1190 元,同比下降 11.52%。可见,长三角三省一市中，除了江苏省旅游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略有上涨外,其他两省一市均有所下降。

(二)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消费环境亟待优化

同程旅行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 “五一”期间,露营、民宿、温泉、乡村游等跻身出游关键词之列。随着人们更加关注旅游出行的安全与健康,周边游、乡村游、自驾游、康养游等模式逐渐兴起,原有的旅游软硬件设施难以满足新的需求。比如,风景名胜区的停车场、移动网络、电动车充电桩等设施供给方面存在不足,山区、乡村景点尤为突出;“露营热”背后的软硬件设施并未跟上,部分露营地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垃圾处理、卫生间修建、明火烧烤等问题亟待解决;景区对消费者帐篷搭建、户外防护、应急管理等知识的普及力度不够,加之不少景区景点并不具备露营条件，部分露营地的规模和品质跟不上,容易导致灾难的发生。

(三)旅游管理服务智能化滞后,消费便捷度较低

在消费升级背景下，自由行游客对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分散性和个性化需求，促进了综合性智慧旅游服务平台建设。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都开发了各自的智慧旅游服务平台，分别是 “游上海”、“苏心游”、“浙里好玩”和“游安徽”。但是,这些平台对于消费者来说知名度不高。华为软件应用商店显示,截至 2022 年 5 月,“游安徽”累计下载量为 18 万,“苏心游”累计下载量仅为 1 万。其原因是软件的内容与功能都不够完备，比如安徽省的“游安徽”的特产购物模块仅仅停留在浏览页面上,未实现一键式线上购买功能。此外,各 App 或者小程序都存在景区防疫政策更新、路线引导优化、景区景点人流信息实时共享等管理服务未实现一体化的问题，制约了旅游出行的需求潜力释放。

四、长三角地区旅游消费潜力的释放路径

(一)开展“本地人游本地”惠民活动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虽然各地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但是区域间防疫规定存在差异,人们对跨区域旅游仍有所顾虑。随着短途旅行需求上升,长三角地区应倡导“本地人游本地”的旅行方式,顺应旅游消费趋势,释放旅游消费潜力。第一,支持长三角地区 A 级景区发行年度联票,为居民提供套票优惠,为抗疫模范、先进群体发放免费券。第二,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电商平台发放文旅电子消费券。第三,支持长三角地区联合发放一卡通,鼓励工会将之纳入会员采购名录,引导当地金融机构给予购卡优惠。第四,开展旅游消费帮扶活动，鼓励基层工会利用会员会费购买符合规定的文旅产品和服务。

(二)构建全龄化研学旅游体系

研学旅游不仅是深度挖掘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途径,还是释放旅游消费的重要方式。因研学群体人员数量庞大、研学活动复购率高,研学旅游具有拉动旅游消费能力强等特点，长三角地区亟待针对不同年龄段和当地景点构建研学旅游项目体

系。第一,结合2022年初启动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支持各地市规划建设相关研学旅游,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提供研学体验场所,加大研学旅游产品研发创新力度,精心设计参观线路和研学项目。第二,鼓励中小学校组织红色景区、考古公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园区等研学旅游。第三,推进将研学旅游以学分的形式纳入大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引导大学生在假期自行开展乡村振兴和地脉文脉的研学旅游活动。第四,围绕中青年、老年人关注的户外运动、健康养生等需求,大力发展体育健身和中药养生的研学旅游。

(三)组织景区网络营销赛事

受疫情影响,旅游业陷入困境之中,为了避免旅游业停摆,需要组织形式多样的网络营销赛事,以此来激活闲置旅游资源、提升景区知名度、保障旅游从业者的收入。第一,鼓励各旅游景区为消费者提供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旅游资讯获取服务,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进行自我宣传,形成新媒体营销体系,推动旅游服务模式和旅游产品推广方式的革新。第二,鼓励导游充分运用新媒体开展营销推广,以流量贡献、话题贡献、内容美誉度等指标作为标准,按季度开展评比活动,对有重大贡献的个人或组织,政府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第三,鼓励探索旅行网红直播、旅游短视频等旅游新业态和服务新模式,打造文化旅游超级IP,拓展旅游产业价值链。

(四)实施智慧旅游升级工程

旅游智慧化发展是满足消费需求的客观要求,长三角地区亟待优化升级智慧旅游服务平台。第一,支持旅游App平台升级,搭建旅游电商平台,强化综合服务、特色服务、衍生服务等功能,满足旅游者资讯查询、在线预订、评价投诉等全方位出行需求。第二,鼓励物联网、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新技术在旅游景区内的应用普及,增强旅游景区产品的体验性和互动性。第三,鼓励各省创建智慧旅游试点示范景区,在“新基建”的基础上,推动景区电子门票、客流监控、指挥调度、导览讲解等功能的应用,实现景区可视化、智能化管理。第四,拓展智慧旅游产业价值链,支持有条件的旅游企业对在线旅游产品进行深度开发和优化,加速基于虚拟现实(VR)和人工智能(AI)技术应用的旅游产品升级,培育和发展“云游”新模式,鼓励各省建设旅游示范区。

(五)创新旅游保险服务产品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人们对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相关安全因素直接影响旅游消费决策。为增强旅游保险产品的可信度,打消游客的顾虑,提振消费信心,应当对旅游保险服务产品进行创新。第一,开发专属化保险产品,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满足新型旅游模式的安全保障需求,构建吃、住、行、游、购、娱等全方位的安全保障体系。第二,支持保险公司依法依规对停团、退团、行程中止引发的团费损失增设保险产品,降低旅行社经营风险。第三,针对游客出行受疫情变化导致被隔离的情况,探索开发相应保险产品,减轻游客负担,解除后顾之忧。

(六)完善新型旅游设施体系

人们对周边游、乡村游和露营的需求上涨,亟待完善配套软硬件设施体系,为旅游者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服务,提升消费体验感和满意度。第一,加大对红色旅游、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国家考古公园等重点工程项目的资金投入。第二,设立“旅游新基建发展基金”,特别要对革命老区加大旅游新基建投融资力度,拓展景区新基建资金渠道,撬动其他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第三,重点推进一批高品质步行及自行车绿道、夜间旅游灯光、冰雪赛道、低空旅游、智能旅游、客运索道等设施建设。第四,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加快补齐基础配套设施供给短板,加强景区停车场充电桩供给,开展维护、运营等工作,增加无障碍设施、旅游厕所、环保垃圾箱的供给。第五,做好自驾游道路标识、景区标识的更新,完善城市周边旅游停车场、露营场所、周边移动网络的覆盖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适当增加特色民宿、自驾车营地和乡村驿站的建设。

注释:

①利用2013-2019年长三角地区旅游消费数据,通过OLS模型回归得到旅游消费拟合曲线。在此模型基础上,得到2020年、2021年旅游消费拟合值。依据拟合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差距,计算得出长三角地区尚未释放的旅游消费潜力。

参考文献:

[1]宋瑞. 经济新发展格局下促进旅游消费的思路与方向[J]. 旅游学刊,2021(1):3-5.

[2]钟沈军. 旅游化是新时代发展的重要动力[J]. 旅游学刊,2018(10):3-5.

[3]刘军. 双循环背景下我国旅游业发展对扩大内需的助推效应[J]. 商业经济研究,2022(9):189-192.

[4]妥艳媜, 陈晔. “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内旅游消费新趋势与促进战略 [J]. 旅游学刊, 2020(6):8-10.

[5]Zhang D, Li H, Zhu H , Zhang H & Man, C. W.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urban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commercial tourism city[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2021,73:1-12.

[6]Kare M, Soriano D R, M Porada-Rochoń.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travel and tourism industry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0, 163:1-14.

[7]邹光勇, 马颖杰.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上海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新问题、新机遇与新方向[J]. 旅游学刊,2021(2):10-11.

责任编辑:马俊

(上接第 29 页)

尤其是引导城镇机关事业单位和市民参与 “共建林”建设,全力提升林地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四是鼓励广大群众深入开展“四旁四边四创”国土绿化提升行动,推进“村村栽万树、林果进庭院”绿色家园建设。

(三)深入实施碳汇森林行动

一是鼓励县(市)区组织谋划森林碳汇项目或计量检测等基础工作,建立森林碳汇动态数据库。二是结合县(市)区林业建设重点工程和国有林场森林经营项目,建立林业碳汇项目储备库,以备碳汇市场交易。三是鼓励市内重点排放企业合作开发林业碳汇项目,创新方式参与林业碳汇交易,实现森林价值,促进居民增收。值得借鉴的是,2021年, 宣城市旌德县庙首林场与司尔特公司达成交易——以 14.57 万元购得 3036 吨 CO_2 排放权[1]。四是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等方式,设立合肥市林业碳汇基金,同时引导县(市)区创造条件建立林业碳汇基金或合肥市林业碳汇基金子基金。对相关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依法落实税收、环保等方面政策优惠。

(四)深入实施金银森林行动

一是要求各级政府在林地保护前提下,以“亩均论英雄”,引领林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合理利用森林景观、自然环境和林下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康复疗养等产业,同时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二是鼓励企业、大户等主体积极参加植树造林与林地管护并依法依规获取收益。企业、大户等主体应积极开展林业结构调整,提升林业效益。政府应允许合理间伐、移栽林木等,大力改造“低产低效林”。鼓励有意愿有能力的市场主体因地制宜发展林业,发展“飞地林业”和林下经济。三是积极打造林经济示范区。鼓励各地充分利用丰富的林下资源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因地制宜开发林草、林菜、林菌、林药、林禽、林畜、林蜂等产业。大力开展林下产品经营加工,延长林下经济产业链、价值链,同时积极打造各种产业集群,提高林业综合效益。四是逐步提高生态补偿标准。鼓励乡(镇)、村(社区)以及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生态保护,并让乡(镇)、村(社区)和当地居民获得合理的生态补偿,不断增强其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促进林业保护与经济发展实现良性循环。

(五)深入实施活力森林行动

一是大力推进林权改革。鼓励农户依法有偿流转林地,积极发展林经济,促进林业规模化、高效化发展。二是创建信息化平台,依法上线“三线一单”,推进精准管理,提高线上管理效率和效果。三是引导并鼓励在肥的金融保险部门加强贷款与保险支持。金融保险部门须加强相关研究,优化贷款和保险办理流程,积极落实“益林贷”“林长制国元护林保”,切实将国家及省市生态惠民政策落实到位。

参考文献:

[1]我省林业碳汇交易第一单落地宣城[N].安徽日报,2021-08-26.

责任编辑:马俊

“城市大脑”建设：价值意蕴、短板审视与优化路径

刘雅静

（宁夏区委党校，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作为城市智能化、数字化升级转型的必然产物，“城市大脑”是一项极具现实价值的城市治理与服务变革创新型实践。其在建设应用过程中会受到诸如相关顶层设计缺失、制度化保障不足、数据资源难以有效赋能、常态化建设运营模式亟待完善、应用场景相对单一等因素的影响，需要从强化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整合汇聚公共数据资源、构建灵活高效的建设运营模式、聚焦场景牵引与应用等方面入手，开拓“城市大脑”的有效落地模式。

[关键词]城市大脑　数字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以及域内人口的持续增长，城市日益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综合系统，承载着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职能，城市治理也面临着诸多潜在的风险挑战。同时，社会公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对城市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现实背景下，实现智能化、数字化治理成为推动城市治理变革的必由之路。作为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大变量与增量，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前沿技术将给城市治理理念、手段、模式等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如何运用新兴数字技术赋能城市治理，通过对城市治理数据的精准分析，实现城市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精准联动，为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城市公共服务，创建安全宜居的城市环境成为当前城市治理中亟需解决的问题。而“城市大脑”作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竞争力的新型基础设施，近年来受到地方政府的广泛关注，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速了其由“积极探索”向“全面建设”的转变。在此现实背景下，各地城市应针对疫情精准防控、城市智慧治理、民生优质服务中存在的诸多短板，以新基建为契机，加快建设“城市大脑”，全面推动城市管理向“全感知、全物联、全可视化、全监管”方向发展，使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变得真正“智慧”起来。

一、价值意蕴：建设“城市大脑”是驱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必然选择

作为城市智能化、数字化升级转型的必然产物，“城市大脑”能够对城市治理问题、城市运行状况和公众现实需求等进行实时感知，提升政府部门对城市各类风险隐患的有效预警、准确研判和协同处置能力，真正实现对城市全覆盖、全时段、

收稿日期：2022-11-21

作者简介：刘雅静，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决策咨询部教授。

全周期的高效治理。来自杭州、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实践已经证明,“城市大脑” 借助数字技术与城市治理的有机融合，能够显著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质量,实现公共价值的最大化,是一项面向当下和未来、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城市治理与服务变革创新型实践。

(一)“城市大脑”有助于促成城市治理向整体性智治模式转型

在城市这样一个日趋庞大且复杂的场域中实施有效治理,在具体的城市治理情境中,面对的公共治理需求是多元、分散、动态的,而传统的政府部门治理职能的相对单一、集中、静态化,以及基于经验驱动的简单化治理方式，使得政府治理职能的“点”状运行与城市公共事务的“面”状扩散无法有效匹配对接,引致城市治理运行不畅、治理效能相对低下，使得城市治理陷入了因缺乏有效的集成性数据驱动而导致的缺脑无序之中[1]。同时,在城市治理的过程中，由于不同政府部门城市公共事务管理标准的不一致、管理规则的松散性以及管理的约束性不强，也容易造成城市治理的大而化之和效能低下。为有效破解以上困境,城市治理迫切需要进行流程再造，形成以精准高效回应城市居民需求为中心、以城市有序高效运转为基础的智慧治理模式。而“城市大脑”能够借助大数据收集分析、大规模拓扑网络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精准识别城市各领域潜在的治理需求，并实现自动式的敏捷即时回应。所以,“城市大脑”的建设与运营能够为政府提供一个综合集成度高、数据共通共享、具备实时场景应对功能的城市治理智慧平台,赋能政府以整体性形态准确接收、即时回应社会公共需求，并通过其神经中枢系统的高效指挥和线上业务流程的重组整合，有效弥合政府传统科层制组织结构内部存在的缝隙，为城市地域范围内跨层级、跨部门的公共治理资源协同联动提供了新的有利契机和实现机制。在 “城市大脑”治理平台的前端,城市居民可一键报送现实需求;在其后端,城市公共事务治理可以具体的“一件事”为逻辑起点,构建涵盖数据采集、精准识别、分流交办、应对处置、评估反馈、督办考核等环节在内的在线化闭环治理体系，进而推动城市场域内的整体性精准治理实践，最终实现向治理场景全领域、治理对象全周期、治理要素全覆盖的整体智治新模式的转变。

(二)“城市大脑”有助于促成城市公共服务向精准高效智能模式转型

在传统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中，受到思维模式、体制机制、技术能力等方面的影响,面对日趋复杂多样的城市公共事务和民生服务诉求,由于业务流程不畅、供给力量不足、沟通手段缺乏,政府部门更多呈现出一种被动应对的状态,极大制约了城市公共服务效能和质量的提升，影响了社会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当前,作为数字赋能城市治理变革的创新性举措,“城市大脑”已成为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实现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标配工程和重要抓手，而作为一个巨大的数据归集、共享与处理平台,其对于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质量能够起到显著的支撑作用。具体而言,“城市大脑”以城市治理多元实时场景中的数据要素为核心[2],依托更为先进的云信息基础设施,在强调数据、技术、业务协同的前提下,聚焦与社会公众息息相关的政务服务、民生服务领域,打造集精准感知、快速归集、实时分析、统筹协调、指挥监督、高效服务、综合评价为一体的城市运营赋能平台。在进一步增强对城市运行趋势与规律分析能力的基础上，借助一体化场景的应用开发和多领域拓展,“城市大脑”能够对城市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相关需求做出快速、科学的智能化响应，从根本上有效解决城市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堵点,持续优化城市公共资源的配置状况,有效降低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在这一复杂的演进过程中,“城市大脑” 一方面可以最大程度收集、归纳、整合政府部门公共服务的历史数据,另一方面,又可借助技术手段将政府未来的公共服务供给活动数字化。数据开放和由技术衍生的政社互动升级形成了政府改善公共服务的倒推动力,进而使政府部门的行动逻辑与“城市大脑” 中枢平台的功能效应之间产生了交互影响和有序耦合,并借助“城市大脑”的数据要素价值与场景应用创新驱动，实现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最佳效果，更好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二、短板审视:“城市大脑”建设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对“城市大脑”的内涵缺乏统一认识,相关顶层设计缺失

由于“城市大脑”属于地方层面实践先行的新生事物,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规范性、系统性的指导文件,导致对其内涵界定、顶层设计、建设模式等方面未能达成统一认识。笔者通过对部分城市的实地调研发现,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对“城市大脑”的内涵、要素、架构、功能等普遍存在理解不深刻、不到位的现象,如将“城市大脑”简单理解为对现有智慧城市管理运营平台的升级改造,将其建设重点简单停留于技术实现层面。一方面,这有可能使“城市大脑”变相演变为单纯的系统集成项目,无法充分发挥其一体化总枢纽的功能[3];另一方面,有可能只关注软硬件部署与部门业务系统接入,而对“城市大脑”建设中更为关键的问题,如统筹协调、管理运营、数据高效共享等重视不够。同时,诸如未能及时出台有关“城市大脑”建设应用的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缺乏全面性系统性的推进思路等顶层设计层面的缺失,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大脑”建设应用的顺利推进。

(二)与“城市大脑”建设相适配的制度化保障不足

“城市大脑”建设涉及组织、政策、标准等制度维度的配套支撑,其建设、应用、维护也需要管理、业务与技术等多部门的协同联动。目前,一部分城市虽已成立相应的主责管理与推进机构,但相关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于平台建设,加之受到部门间权责不清、职能交叉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城市大脑”建设存在管理分散化以及协调联动不足等问题。具体表现为已建“城市大脑”业务板块中,有相当部分是基于各部门、各行业现有的业务系统,因业务协同流程与机制的缺失,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原有“烟囱式”建设模式下的行业与部门壁垒,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的协同力度明显不足,容易导致各自为政、安全隐患多、系统兼容难等诸多问题。

(三)数据资源难以有效赋能“城市大脑”建设

数据的汇集、整合与共享是“城市大脑”建设与应用的必备前提,城市治理模式转型与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在相当程度上也需依托于各领域数据资源的动态更新与有效共享。一些地方负责“城市大脑”建设的牵头单位缺乏对可用数据资源的整体性规划和系统性摸底,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体系也亟需完善。在这方面,虽然国家和地方层面已出台了数据共享交换的相关政策,但目前政府体系内部大数据建设应用“步履蹒跚”、“数据烟囱”林立的现象仍较为普遍。从已建成的省级与市级政府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来看,受制于平台数据汇集与治理能力,平台数据的供需对接及流通共享效率仍有待进一步提升,诸如想用的数据无法共享、能够共享的数据又用不上等现实问题亟待解决,导致现有数据资源难以有效赋能“城市大脑”。

(四)“城市大脑”常态化建设运营模式亟待完善

不同于其他智慧城市工程,“城市大脑”是一个需要更新迭代、持续推动应用创新的系统工程,其价值发挥更多地体现于后续的可持续运营服务而非单纯的前期建设。然而,受制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能力、人才储备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城市在推动“城市大脑”落地的过程中,出于运营风险防控等方面的考虑,常态化投资不足、建设与运营模式缺乏创新,习惯于依赖政府投资、单一头部企业承建的投资建设模式,市场竞争明显不足,使得重平台搭建而轻数据治理、重工程建设而轻后续运营等现象仍较为普遍,导致“城市大脑”运维成本过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五)“城市大脑”功能发挥与应用场景相对单一

目前,很多地方的“城市大脑”建设应用还处于探索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场景应用的广度与深度均有待拓展,在建的“城市大脑”有的仅仅局限于“政府大脑”或“行业大脑”,并未触及深层次的核心问题,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大脑”还存在相当的差距。与此相对应的问题就是“城市大脑”的应用场景不够丰富,仍停留于交通管理、网格化治理等较为单一传统的领域,在智慧医疗、在线公共服务、产业发展、应急处置等经济与民生领域则普遍缺乏深度有效的场景开发,未实现面向城市治理服务各领域的全面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三、优化路径:加快推进“城市大脑”建设应用的实践进路

(一)强化顶层设计,明晰“城市大脑”发展路径

一方面,借助数字中国建设的相关宣传教育活动,引导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紧跟数字社会发展形势,认识到“城市大脑”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对于城市发展和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性,摒弃对其的一些不正确认知,为“城市大脑”建设应用的顺利推进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另一方面,鉴于“城市大脑”的建设应用是一项具有全局性、综合性、长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省级层面从全局视角出发,结合当地城市发展状况,加强顶层指导和统筹推进。一是强化“城市大脑”顶层设计,在对城市各领域、各层次及建设“城市大脑”的各种促进因素与限制因素进行统筹考虑的基础上,将顶层设计与基层诉求相结合,尽快在省级层面形成“城市大脑”建设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明确“城市大脑”发展演进的总体要求、内涵要素、基本功能等,形成系统性的推进思路和总体方案,指导本地区“城市大脑”建设有序推进。二是省级层面应尽快建立大数据行政管理部门,围绕政府间的数据流通共享、政企与政民间的数据采集开放共享,建立区域性的数据归集共享机制。三是立足不同城市的发展定位、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各层级各部门各行业应用需求,综合考虑国家和地方相关要求,成立“城市大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实现其与智慧城市、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的整合与统一,研究部署、统筹推进“城市大脑”建设,将五年作为一个规划、建设周期,加快制定出台“城市大脑”建设应用五年总体规划和年度行动方案,明确各阶段建设重点,进一步明晰“城市大脑”建设目标、建设运营模式、实施路径等内容,并及时研究解决“城市大脑”建设应用中的问题,确保“城市大脑”规划、建设与应用的协调统一。

(二)创新体制机制,规范和引导“城市大脑”建设

一是完善“城市大脑”建设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首先,成立“城市大脑”建设工作专班,将网络信息化、大数据等职能部门确定为主责机构,成立“城市大脑”运营管理中心或指挥中心,负责具体组织落实“城市大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决策事项,统筹推进“城市大脑”体系建设、项目立项、招标、验收等工作。其次,搭建协作平台,实现部门有序分工、高效配合与联动运行。依托“城市大脑”,将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的市直部门统一吸纳为“城市大脑”的协同建设与应用单位,形成“城市大脑”城市统筹、部门联动的建设应用体系,促进城市运行从各自为政、单点突破向全局优化、一体联动转型升级,真正做到对城市治理需求的整体性回应。二是建立“城市大脑”建设项目与资金统筹监管机制,强化从项目审批、立项、建设到应用的全口径统筹协调与全生命周期监督把关,全市跨部门数据共享与应用系统、通用硬件等不允许独立搭建,同时明确经费拨付以数据开放共享为前提,从源头杜绝“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的产生。三是建立“城市大脑”建设与应用的督查考核评估机制,将“城市大脑”总体规划和年度行动方案的落实落地纳入政府重点督查考核内容,督导激励各部门落实责任分工,分阶段有序推进规划项目建设。同时,通过定期考核评估,持续促进各部门业务与“城市大脑”的深度交互融合。

(三)整合汇聚公共数据资源,优化“城市大脑”建设的要素配置

一是围绕城市治理“一脑通治”、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政府业务“一网协同”,从突破“信息壁垒”“数据孤岛”“业务障碍”等困境出发,加快各级政府数字化转型,从内部打破不同政府层级间、系统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整合涉及社会信用、不动产、企业注册、人口库、法人库等数据信息及视频资源,实现城市治理的业务数据、物联数据、视频数据的集中统一管理,并依托“城市大脑”将原有的各类平台如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警务、智慧城管、智慧环保等进行整合,实现“城市大脑”基础平台与现有各类业务系统的互联互通、协同联动。二是建立“城市合伙人”制度,通过企业数据、社会组织数据上云,加强政企、政社间的数据共享,从外部打通与运营商数据、城市公共服务数据等的数据共享通道,将政府单方面碎片化供给转变为多元主体协作供给,形成全面、动态、实时的城市治理海量“数据资源池”,并依托数据流通、

算力升级、应用场景开发等打通城市的“毛细血管”,进一步释放数据潜能,让各方从数据共通共享中获得更多价值与利益,进而实现从需求端驱动数据共通共享,有效克服制约“城市大脑”发展的瓶颈,让“城市大脑”真正实现“赋能”。三是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数据安全。数据要素的安全是“城市大脑”建设的根基,建议成立城市数据安全监测防护中心,借助数据安全管理机制与相关技术支撑,在推进数据采集、处理、共享的过程中,确保数据的安全可控以及数据传输、使用的可信合规,确保“城市大脑”安全高效运行。

(四)加大资源保障力度,探索构建“城市大脑”灵活高效的建设运营模式

一是强化“城市大脑”建设财政资金保障。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的统筹支持力度,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将“城市大脑”建设运营资金纳入省市两级财政年度预算,给予“城市大脑”示范试点项目专项资金补助,切实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积极推动“城市大脑”在营商环境、疫情防控、智慧医疗等应用需求突出、基础条件相对较好、企业市民获得感强的领域的深度应用与推广。二是探索构建政府引导、国资主导、社会资本参与的“城市大脑”投融资机制,成立由国资主导的“城市大脑”建设运营公司,承担“城市大脑”集成建设和运营管理职责,实现本土化运营;同时,制定、实施支持“城市大脑”建设的财税政策,采用设立产业基金、发行政府债、鼓励引导有技术实力的企业通过PPP模式参与等方式,借助规范的市场运作,推动政企合资共建“城市大脑”。三是完善人才保障机制。创新“城市大脑”相关建设运营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机制,将目前急需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纳入各地紧缺人才目录,拿出专项行政、事业编制,加大对“城市大脑”领域紧缺人才、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和引进力度。同时,以建立“城市大脑”产业联盟或创新实验室的方式聚集一批企业与人才,为“城市大脑”建设运营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撑,形成“城市大脑”良好的建设和创新生态,保障其可持续健康发展。

(五)聚焦场景牵引与应用,开拓“城市大脑”有效落地模式

“城市大脑”建设归根结底要落脚于服务市民、服务发展、服务安全,因此,必须坚持问需于市民、问需于企业。应以城市治理需求为导向,以高频次应用场景为牵引,在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城市运行、市场监管等领域,打造更多具有普惠性、牵引性和良好感知性的智慧应用示范场景。为此,一要围绕“发展”与“安全”两大主题,持续强化“城市大脑”作为数据、平台、系统、业务交互集成融合的“总枢纽”“总调度”作用[4],重点聚焦城市治理和市民服务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摒弃碎片式、单点式服务,以创设跨领域多部门协同应用场景为突破口和切入点,不断拓展优化交通、城管、警务、应急、环保等领域的应用场景,有针对性地打造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易用实用管用的智慧应用场景,以友好的界面与良好的体验感增加企业与市民使用的频率与黏性,进而通过应用场景的有效拓展来带动“城市大脑”的建设。二要聚焦具体应用场景的开发需求,加强政府与互联网、大数据企业的合作。政府相关部门可定期提出应用场景开发需求,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国内头部企业,如与阿里、腾讯等强化平台服务合作,与携程、美团等加强业务应用合作,充分利用其在数据收集、处理及场景应用领域的创新能力与专业优势,合力创设一批数字化、智慧化应用场景,进而推动“城市大脑”周边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锁利铭,王雪. 城市智能化升级的复杂逻辑、耦合变迁与治理转型——以“城市大脑”实践为例[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72-85.

[2]张蔚文,金晗,冷嘉欣. 智慧城市建设如何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新冠疫情考验下的杭州“城市大脑”[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117-129.

[3]本清松,彭小兵. 人工智能应用嵌入政府治理:实践、机制与风险架构——以杭州城市大脑为例[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0(3):29-42.

[4]王婧,许旭,黄向前. 规避城市大脑建设四大误区[J]. 信息化建设,2021(2):56-59.

责任编辑:朱少家

国内学界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杨荣刚

（南京财经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构成部分，事关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围绕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生成背景、基本内容、理论特色、实践价值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着整体性研究不足、研究深度有待提升、研究路径较为单一、实证研究有待加强等不足。今后深化拓展这一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廓清意识形态话语权相关概念基本内涵及逻辑关系等基础问题；需要破解要素性研究与系统性研究的贯通融合等核心问题；需要推动研究范式创新，将宏观规范性研究和微观实证性研究结合起来，依托多学科研究资源和研究方法来推进研究进展。

[关键词]习近平　意识形态　话语权　研究述评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关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的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意识形态领域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国内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和挑战，习近平围绕意识形态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和制度安排。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2 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议题，近年来，国内众多学者基于各自学术背景和研究视野，对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进行了广泛研究和讨论，产生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本文旨在系统总结和梳理归纳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指明其理论贡献和不足之处，以期为拓展和深化这一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

一、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生成背景

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环境和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众多学者围绕国内外形势变化分析了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生成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基础，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理论基础说

该观点分析了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协同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立项编号：22MLC011）、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政专项“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立项编号：2022SJSZ0096）、南京财经大学党建思政课题“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内在机理研究”（立项编号：YRGXW22002）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2-11-22

作者简介：杨荣刚，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述生成的理论基础，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创新。张传泉从理论逻辑层面分析了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2]。杨雨林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话语权物质论”和“话语权辩证法”相统一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阶级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思想是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理论根基[3]。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权建设的历程及产生的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直接思想来源[4]。还有学者从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出发，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意识形态之“根”，是习近平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重要源泉[5]。

(二)历史经验说

该观点主要从国际国内历史经验教训出发分析和阐述了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生成的历史背景。肖唤元、秦龙认为，以历史经验教训为参照，立足本国国情和实际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特征[6]。马荣华认为，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丧失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历史上的挫折和教训是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生成的历史基础[7]。还有学者分析了苏共意识形态话语权丧失的危害即苏联共产党失势、人民思想失控、联邦国家失守，并以此来强调当前习近平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总之，以史为鉴，从历史发展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三)现实挑战说

目前学界对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生成的现实境遇研究较为丰富和全面。学界普遍认为，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的现实逻辑。史小宁认为，习近平重视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问题是应对全球化、信息化和西方社会思潮挑战的需要，是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功能性价值的需要，是推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持续提升的需要[8]。有学者从世情(“西强我弱”的话语形势未根本扭转)、国情(主流意识形态面临严重挑战)、党情(党对意识形态管控力减弱)三个层面分析了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时代基础[7]。还有学者从国内复杂思想局面、网络新媒体、思想意识多元化、利益多元化和社会新阶层等多维度分析了习近平重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实背景[9]。

总的来说，学者们对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生成背景的分析大体呈现三重理路，即从理论逻辑出发阐述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生成的思想渊源，从历史逻辑出发阐述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生成的历史背景，从现实逻辑出发阐述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生成的时代境遇。

二、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基本内容

众多学者以不同视角为切入点总结和阐述了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基本内容，达成了许多共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指导思想论

该观点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质和核心。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人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科学思想武器，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体，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王锡森认为，摆正马克思主义的位置，明确其指导地位，是构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本前提[10]。谢超林认为，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质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11]。在这一点上，众多学者达成共识并一致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构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本前提和内在要求。

(二)基本原则论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该观点认为，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即坚持党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全面领导。唐爱军指出，习近平十分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导向问题，明确提出了党管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12]。

史小宁认为,习近平发展了意识形态“党性论”的内涵，提出了党性与人民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8]。汤俪瑾认为，党的领导权是意识形态工作中必须要明确的问题,是意识形态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离不开对党的领导权的把握[13]。众多学者认为，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工作关键在党,只有坚持党性原则,才能确保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才能时刻保持敏锐性和判断力,防范和战胜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风险挑战。

(三)战略地位论

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指标，习近平以其敏锐洞察和远见卓识，将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置于党和国家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学者列举了习近平历次讲话中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重要性的重要论述，阐述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与中心工作即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指出了习近平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战略地位认识的不断深化[2]。还有学者认为,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定位,是以唯物史观基于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科学认识的结果，以战略思维基于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科学认识的结果，以系统思维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推进的科学认识的结果[7]。

(四)建设主体论

话语主体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能动性因素，是话语内容的创新者，也是话语平台的建设者。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必须要高度重视话语主体自身建设。郑曙村认为,习近平强调要树立大宣传工作理念，要突出强化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话语建设的主体责任，同时要发挥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14]。王霞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主体,宣传思想部门和新闻舆论工作者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15]。朱文婷认为,党员干部和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承担着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两者分别扮演着宏观和微观层面的话语主体角色[16]。还有学者认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要培养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有机知识分子”,习近平关于培养理论功底扎实的学科带头人和年富力强的青年学术骨干的论述正是体现了这一点[16]。

(五)重点任务论

众多学者基于不同视角阐述了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战略部署和重要任务。杨雨林认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打造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习近平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战略思考，是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核心和关键[3]。有学者认为,守好互联网这个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和牢牢掌握新闻舆论话语权是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点所在[17]。还有学者认为,国际话语权是关乎国际影响力和国家形象的战略问题，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征，创新对外宣传工作、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是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12]。总之,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研究视野和学科背景分析了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任务,各有侧重。

(六)价值导向论

“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是意识形态工作首要的、核心的问题。该观点阐述了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即意识形态工作的谋划和开展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徐稳认为,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所蕴含的内在价值逻辑，也是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的价值导向[18]。有学者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问题导向,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提升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10]。还有学者认为，民意的合理表达和民需的有效满足是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素材和内生力量，习近平多次强调要贴近民心民意、关注民生民需,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在满足民众利益诉求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民间认同力[19]。

(七)实践路径论

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具体实践路径。李芳园从打造意识形态话语新理论新体系新范式、完善话语表达和宣传模式、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指向[19]。肖唤元从话语主体创新、话语载体整合、话语主体构建、话语评价优化等四个方面阐述了构建网络

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路径[20]。孙寅生从构建国际话语权的角度分析指出,要积极掌握主动权,主动参与议题设置,提高引领世界话语权的能力;要建立覆盖全球的全方位、立体化的媒体传播系统,不断提升国际舆论话语权;要形成政府、媒体、智库、民间机构和公众等多主体联动的强大合力,增强国际话语权[21]。还有学者从不断创新具有中国精神的话语内容、不断丰富具有民族特色的话语表达、不断开拓具有时代气质的话语平台等方面阐述了新时代建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基本理路[15]。

三、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基本特征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论述形成于特定的世情、国情与党情之下,蕴含着显著的理论特色和鲜明品格。众多学者以此为视角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具体观点如下:

(一)价值取向上的人民性

该观点认为,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论述在价值取向上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并在具体实践安排上充分体现和贯彻了这一价值取向。刘洋认为,习近平始终将人民至上作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价值追求,并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就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思想提出了具体的实践路径和实践要求[22]。史小宁认为,人民既是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价值主体,又是实现其价值的实践主体,人民至上是始终贯穿于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重要论述的价值主线[8]。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立足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新了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观,体现出鲜明的民生化特色[23]。还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民生为导向”构建社会层面话语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24]。由此可见,在人民至上这一根本价值取向上,众多学者达成了共识。

(二)思维方法上的辩证性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系列重要论述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和科学方法。张林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是对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超越,是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形成的根本思维方法[25]。武振华认为,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先进性与现实性、价值性与工具性、阶级性与群众性、建设性与批判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26]。杨洋认为,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论述蕴含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活力与有序相统一、建设与斗争相统一、继承与创新相统一、“时、度、效”相统一等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27]。还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体现了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相统一、问题倒逼与改革创新相统一、整体性思维和重点突破相统一、针对性和务实性相统一等思想方法,从根本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3]。由此可以看出,辩证思维的理论智慧和科学的方法支撑是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鲜明特色。

(三)工作导向上的问题性

精准把握和深刻分析当前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是科学谋划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武振华认为,每一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问题,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使命为引领,是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逻辑起点[26]。张林认为,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论述是对新形势下新问题和新情况所作出的战略回应,但这种回应并不是被动回应,而是包含着“解决问题”的理论自觉[25]。有学者认为,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基本观点和实践要求,既是具有前瞻性的探究,也是现实问题倒逼的结果,不仅强调“破”,更重要的是强调“立”[23]。由此观之,众多学者一致认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显著特征之一。

(四)理论体系上的整体性

该观点认为,习近平从宏观层面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提出了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战略部署和原则要求,对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地位、任务、立场及策略等重大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入的阐释,形成了具有完整内在逻辑关系的体系化的理论形态。刘希刚、王永贵认为,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是价值整体性、理论整体性和策略整体性有机统一的体系[28]。唐爱军从功能论与形势论、目标论和实践论、立场论和方法论等三个层面对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进行了整体性阐释[29]。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逐渐形成一个有

机统一的“兼具历史底蕴与时代内涵、融合全局理念与全球视野”的理论整体，同时，该学者从理论渊源和内容构成两个层面阐述了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整体性面貌[8]。还有学者从“理论抽象”“空间意象”“实践具象”三个立体维度探讨了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系统性思维，体现了理论历时性、空间共时性和实践即时性的有机统一[30]。

（五）话语表达上的创新性

话语表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直接影响话语的传播效果。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论述展现出了极富创新性的话语表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话语风格。肖贵清认为，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党在新的历史阶段政治话语的集中体现，蕴含着丰富的学术话语，同时又吸收了诸多大众话语素材，实现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31]。邢晓红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具有系统性，是结构创新与功能创新的有机统一，体现出话语表达大众化、话语诉求民生化、话语传播多样性、话语内容现实性、话语语境通融化五重维度[32]。吕峰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具有四大鲜明特色，即：善于讲故事，使话语叙事情理兼备；善于用修辞，使话语阐释生动形象；善于高度概括，使话语呈现言简意赅；善于运用群众语言，使话语讲述通俗易懂[33]。还有学者认为，习近平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作为参照标准，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创设主流意识形态的诗词、俗语和比拟三种标识性实践具象，达到了以大众话语引领大众意识的话语权效果[30]。总之，在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层面，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多维度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也达成了诸多共识。

四、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

部分学者对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进行了研究，可以概括为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两个维度。

（一）理论价值说

该观点主要分析了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中的重要理论贡献和理论地位。有学者认为，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精髓，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同时立足于现阶段的世情、国情、党情提出了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重要内容[14]。还有学者从唯物史观视角阐述了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理论贡献，认为这些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当代内涵[34]。

（二）实践价值说

理论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论述是我们构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实践指南。余双好认为，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论述对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工作的方向目标、重点任务和基本遵循做出了明确指示和实践要求[35]。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系列重要论述为在把握时代主旋律的现实条件下彰显马克思主义价值引领、凝心聚力、舆论指引等作用做出了明晰判断，为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指引[19]。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主要在于应该学会运用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原则来应对和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现实挑战[36]。还有学者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抵制西方话语霸权、推动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中国化和世界化等角度阐述了实践意义。

五、深化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经过以上对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可知，当前学术界围绕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展开了深入研究，研究内容丰富、研究问题精准、研究视野宽广，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理论参照和学术积累。同时，也应看到当前研究尚存在研究内容较为零散、研究视域较为狭窄、实证性研究有待加强等薄弱点。因此，进一步深化拓展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应该把握以下几个重要着力点：

（一）厘清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基础问题

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是开展系统性和整体性研究的前提。意识形态研究领域观点纷呈，纷繁复杂，只有厘清意识形态话语权相关基础理论问题并达成一致，才能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中达成思想共识。首先，厘清意识形态话语相关概念的本

质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学界众多学者围绕意识形态话语等相关概念进行了多维度的理论探讨,但仍未形成广泛的权威性共识。主要表现在一些核心概念的本质内涵和外延边界仍较为模糊,如意识形态话语权、政治话语权、文化话语权、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等等。多数学者在研究中采取回避和模糊处理的方式,缺乏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与归纳。此外,相关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如深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意识形态话语权与话语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等等。其次,进一步挖掘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谱系资源。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话语权基础理论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西方学者相关理论,如葛兰西、福柯等,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中蕴藏的关于话语权建设的理论资源则挖掘较少。这就需要学者们进一步深入挖掘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相关理论观点,从而为研究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提供丰厚的理论滋养和思想支撑。

(二)破解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核心问题

首先,强化对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研究。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系列重要论述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学者们应该坚持要素性和系统性相结合的原则,推进多维度具体研究与宏观整体性研究的贯通融合,以要素性研究巩固支撑系统性研究,以系统性研究提升统摄要素性研究。一方面,要深化对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专题性研究,扫除研究薄弱点,如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研究、哲学基础研究、实践基础研究等等。另一方面,要强化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系统性研究。要在强化解释阐述型研究的基础上拓展理论建构型研究,努力实现从文本解读、理论宣传到理论体系建构的转变。如强化出场逻辑研究的系统性,从整体、宏观上分析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形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等等。要将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置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框架中进行研究,更要将其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叙事中去把握。其次,拓展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研究视域。从时间维度看,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论述杂糅于不同时期的不同讲话中,对此,学者们应该强化研究的持续性和历史性。同时,要扩大研究范围,加强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教训的研究。从空间维度看,学者们要拓展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国际视野,跳出就中国论中国的窠臼,加强对苏联、东欧及西方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经验与教训的研究,同时,要关注国外学者对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重要论述的最新研究成果。

(三)创新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研究范式

首先,丰富研究视角,挖掘研究资源,加强多学科研究的视域融通。从学科研究视角看,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涉及哲学、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现有研究成果学科视野相对狭窄,学科研究交叉性不强,成果形式也较为单一。因此,要打破单一学科视角造成的研究壁垒,充分吸收和借鉴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研究资源和研究方法,依托多学科联合攻关,把问题研究深、研究透,推动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微观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学科交叉的广域视角提升理论研究水平。如可以借鉴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获取第一手实证数据资料;借鉴传播学范畴和原理,分析意识形态话语传播与接收过程;等等。其次,创新研究方法,强化实证研究,提升对策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当前学界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偏重宏观叙事和理论阐释,而微观层面的实证考察如个人访谈、调研问卷、测算模型等则较少,这就大大降低了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现实状况掌握的精准度和可信度,与此相对应的实践对策分析也趋于理想化,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学界下一步要将宏观规范性研究和微观实证性研究结合起来,在强化基础学理研究的基础上拓展实证性研究,进一步提升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现实状况的准确判断和精准把握,进而提升对策研究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张传泉.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及理论品格[J].理论学刊,2022(4):5-14.

[3]杨雨林.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战略思考 [J].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8(3):5-11.

[4]陈石明.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论述探析[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376-383.

[5]冯刚,张发政.论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思维[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4):1-9.

[6]肖唤元,秦龙.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四重特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7):19-26.

[7]马荣华,崔瑞霞.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四大基础[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8(4):10-14.

[8]史小宁.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思想论述及其鲜明特征[J].山西师大学报,2019(4):18-23。

[9]郭瑞,李大棚.重构意识形态话语权:习近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心与指向[J].继续教育研究,2018(9):5-13.

[10]王锡森.习近平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刍议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1):28-33.

[11]谢超林.习近平对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战略思考 [J]. 扬州大学学报,2017(2):29-34.

[12]唐爱军.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思想[J].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6(3):19-23.

[13]汤俪瑾,王慧楠.新时代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路径探析[J].理论建设,2019(2):10-15.

[14]郑曙村,付永玲.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研究[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7(5):35-40.

[15]王霞,孟宪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 [J]. 理论月刊,2019(5):18-24.

[16] 朱文婷.共时、历时和即时:论习近平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三种时态[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6(4):46-52.

[17]龚莉红.习近平新闻舆论话语权思想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7(1):106-111.

[18]徐稳.论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三重逻辑 [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5):67-75.

[19]李芳园,程早霞.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三种价值维度[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5):16-20.

[20]肖唤元,郑晶晶.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四重“论”域透视[J].社会主义研究,2020(1):9-16.

[21]孙寅生.关于加强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思考[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2):112-116.

[22]刘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建设重要论述的四维阐释[J].求索,2020(6):36-42.

[23]王强.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老话题”与“新特征” [J]. 理论导刊,2018(10):36-42.

[24]贺东航.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话语权构建研究[J].东南学术,2017(4):1-8.

[25]张林.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五大理论特色[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7(5):28-31.

[26]武振华.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三维建设方略探析[J].理论学刊,2022(3):5-13.

[27]杨洋.学习习近平关于构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论述[J].党的文献,2018(5):36-43.

[28]刘希刚,王永贵.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整体性探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8(1):9-17.

[29]唐爱军.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整体性阐释[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1-10.

[30]朱文婷,陈锡喜.理论抽象-空间意象-实践具象:习近平建设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三维辨识[J].湖北社会科学,2017(11):19-24.

[31]肖贵清,李永进.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7(1):75-85.

[32]邢晓红.习近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五重维度[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7(1):5-7.

[33]吕峰.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鲜明特色[J].党的文献,2019(6):55-60.

[34]朱建田.五维视角认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论述 [J]. 广西社会科学,2019(5):12-17.

[35]佘双好.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思想形成过程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5):74-78.

[36]张艳斌.习近平意识形态观及其时代价值[J].学术论坛,2015(7):12-15.

责任编辑:马俊

“创新驱动 安徽跨越”等七则

创新驱动　安徽跨越

全面采用自主可控量子通信设备，光纤全长1147公里，可为政务、金融、能源、医疗等多行业提供数据安全服务……今年8月，全国规模最大的量子保密通信城域网在安徽合肥建成启用，将推动共建长三角量子通信城际干线网。

同一个月，地处安徽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实现重大突破，创造场强“相当于地球磁场90多万倍”的新世界纪录；安徽蔚来、奇瑞的新能源汽车月销量分别突破1万辆和2.8万辆，马钢研发的时速350公里高铁车轮在两列“复兴号”上完成装配即将投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局、面向未来，作出“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重大战略抉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原材料和劳动力输出省，安徽新时期面临的发展挑战在我国内陆地区具有普遍性。要实现弯道超车、跨越发展，关键靠创新。

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安徽对标世界一流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推进体制改革破除创新障碍，以科技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近十年来，安徽全省年生产总值从1.72万亿元增长至4.3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实现由全国“总量居中、人均靠后”向“总量靠前、人均居中”的历史性跨越。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安徽实现从农业大省到科技大省、科技创新策源地的角色转变，走出了一条中部地区创新驱动的跨越发展之路。

世界级重大科技成果涌现

“刷新尘封23年的世界纪录！”8月，地处安徽合肥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创造出场强45.22万高斯的稳态强磁场。

“新纪录意味着人类操控磁场的能力达到了新高度，不仅让科学家做研究时看得更准、更清晰，在医疗等多方面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中科院院士叶朝辉说。

强磁场是探索科学前沿的一种极端实验条件，在发现新现象、催生新技术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百余年来，全球已有约20项相关成果获得诺贝尔奖。

据了解，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运行5年来，已支持海内外170多家机构在物理、化学、材料、生命科学等领域开展3000多项前沿研究。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在我国，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安徽对标世界一流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举全省之力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

作为一个可用财力不算富裕的后发省份，安徽将创建国家实验室作为科技创新“一号工程”，挂牌成立全国首个国家实验室。组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成为全国第二个、中西部首个国家创新体系基础平台。新建稳态强磁场、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等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建成3个、在建4个、拟建3个、谋划2个”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梯次发展格局，规划的19.2平方公里世界级大科学装置集中区已现雏形。

坚持“四个面向”，对标世界一流，安徽凝神聚

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发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实现“千里纠缠、星地传密、隐形传态”三大突破;研制“九章”“祖冲之号”系列量子计算原型机,让中国量子算力领先全球;利用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大科学装置全超导托卡马克,创造 1.2 亿摄氏度“燃烧”101 秒的新世界纪录……一批世界级重大科技成果,在安徽涌现。

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安徽注重“从 0 到 1”的原始创新,将科技发展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在量子科技领域,从 2012 年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制备八光子薛定谔猫态,到 2021 年研制出 113 个光子的“九章二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安徽的科研团队十年间九次刷新量子操纵数量世界纪录,推动我国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精密测量三大应用方向上均进入世界第一方阵,部分方面实现领跑。

在强磁场领域,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使我国在该领域跃居世界五强,依托装置取得“首次发现外尔轨道导致的三维量子霍尔效应”等重要科研突破,并衍生出扫描显微成像、国家Ⅰ类抗癌创新靶向药物等应用技术成果。

在聚变能源领域,瞄准建设世界首个聚变示范电站,“人造太阳”近十年来先后创造“2000 万摄氏度 400 秒”“等离子体 1 亿摄氏度”“101.2 秒稳态长脉冲”“1.2 亿摄氏度 101 秒”等世界纪录,使我国在聚变能源研究领域跃居国际前列,并衍生出超导材料、质子医疗、氦制冷等多项应用技术。

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天下科技英才。安徽致力建设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

以“人造太阳”大科学装置为例,近十年来已有来自美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 4000 多位科研人员前来交流合作。“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点亮人类第一盏用聚变能发电的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刚说。

全面深化改革　激活第一动力

瞄准抗衰老和抗癌药物,创业 1 个月就获得 4000 万元投资,3 个月形成 50 多人科研团队,5 个月收购一家细胞制备公司,7 个月 5 层楼的研发中心投入使用……这是日前记者在安徽听到的一个创业故事。

“我回国就是为了更好地践行学术理想。”为了实现“消除衰老以及慢性疾病带来的人间疾苦”之梦,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熊伟回国发展。他的研究路径,是分析对比病患细胞和健康人群细胞的异同。这样的研究至少需检测上万名患者,必须走出实验室,引入市场力量。

2021 年 3 月,中科大出台“赋权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一改传统的“先转化、再奖励”模式为“先分田、后分粮”模式。熊伟带领团队于 2021 年底成立安徽科丞智能健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已投入近 1 亿元建设研发平台,后续计划投入 4 亿元用于临床研究。

“我们已建成针对衰老及癌症的多条科研管线,计划每年收集检测两千人数据,加快推进新药研发。”熊伟说。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近十年来,安徽直面科技创新的痛点、难点、堵点实施改革,出台新机制破解高校成果转化难,创办科技大市场化解成果定价难,完善金融体系解决企业融资担保难。

有技术而缺资金,有发明专利无实物抵押,8 年前成立的安徽华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一度资金断流。地方政府与银行合作推出“创新贷”,通过股权、专利权质押等方式给予公司 1000 多万元低息贷款,帮助它们跨越了创业初期的困难时期。

“得益于这样的支持,团队才没有放弃、改行或贱卖股权,能够始终坚持梦想。”公司创始人黄汪说。如今的华米公司,已成长为年营业额 62.5 亿元、产品进入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智能可穿戴领域领军企业。

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安徽勇做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不断以制度创新激发第一动力。

2012 年,安徽实施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的“中关村政策”;2013 年,试点建设“创新型省份”;2016 年,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如今,崇尚创新的氛围、支持创业的体系已经在安徽形成。技术发明人或团队,可以获得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 70%以上;对于新型研发机构,建立“股权投资+政府基金+社会资本+产业化专项基金+风险投资”的多元化链式投融资体系支持。

为进一步发挥科技体制创新引领作用,安徽

于 2022 年启动建设“科大硅谷”,目标是到 2025 年汇聚各类优秀人才超 10 万名,设立科创基金规模超 2000 亿元,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1000 家。

“‘科大硅谷’是一个开放概念,根本动力仍在于制度创新。”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徐志说,这里将聚焦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企业孵化,以中科大等高校院所全球校友为纽带,打造集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为一体的世界级创新之谷。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高大宽阔的厂房一眼望不到头,起重吊机空中穿梭,轧钢履带火花四溅,一件件崭新锃亮的车轮整装待发……这是记者日前走进中国宝武马钢集团马钢交材厂房看到的场景。

作为安徽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马钢今年研发的时速 350 公里“复兴号”用高铁车轮完成批量生产和发货。

“创新不是口号,是植入思想的意识,是对工作永不满足的追求。”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领军人才、马钢集团马钢交材高级技师沈飞介绍,一节高铁车厢重五六十吨,每一对车轮需长期承受十几吨的往复循环压力。马钢聚力研发高铁车轮近十年,突破一批“卡脖子”难题,产品在稳定性和轻量化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安徽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被誉为“中国铜工业的摇篮”。近十年来,这家企业每年投入的研发资金均超过 10 亿元,产品成为新能源汽车、5G 通信等领域的基础材料,传统重工业靠科技焕发新生机。

记者在铜陵铜冠电子铜箔有限公司看到,一张张薄如蝉翼、滑若丝绸、亮似镜面的铜箔,从生产线下来后直接打捆运走。

“这些铜箔是铜基新材料产品,最薄能做到 4.5 微米,是发丝直径的 1/15,市场供不应求。”该公司总经理甘国庆介绍,铜陵先进结构材料(铜基新材料)产业集群已入选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这样的产业集群安徽有 4 个。

铜、铁、煤炭……安徽传统产业以资源型为主,被形象地称为“铜墙铁壁”。进入新时代,安徽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加快构建以“芯屏汽合”“急终生智”为标识的现代产业体系。

以长鑫存储为代表的动态存储芯片产业、以京东方为代表的新型显示产业、以蔚来和奇瑞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产业组成的“芯屏汽合”,集成电路、白色家电等面向消费终端的现代制造业、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组成的“集终生智”,正成为安徽产业的新特征。

今年夏天,安徽长丰县的比亚迪汽车合肥生产基地门外每天人头攒动,前来应聘者络绎不绝。未来,这里将吸纳六万余名产业工人。

在 40 多公里外的合肥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区,蔚来汽车第二先进制造基地生产线已全线贯通,今年三季度将正式投产。整个园区建成后,将具备年产 100 万辆智能电动汽车的产能,规划年产值达 5000 亿元。

今年上半年,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呈爆发式增长,产量同比增长 90%以上,成为经济增长的生力军。

原始创新开新路,安徽开辟出一批产业发展的新赛道。

“有了这个新技术,手机通话、传信息安全多了!”7 月,合肥市民王女士的手机装上特制的 Sim 卡和 APP,成为全国使用“量子密话”量子保密通信服务的第 32 万名用户。

据悉,这款由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与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在安徽孵化出的创新产品,也成为全球首款规模化的量子通信民用产品。

致力于信息安全的量子通信,能使算力实现指数级提升的量子计算,可将探测精度从微米级提升至“原子级”的量子精密测量……在合肥高新区的“量子大街”上,以芯片、软件、行业标准、商业模式为内容的量子产业链正在形成。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培育新兴产业,锲而不舍、久久为功。近十年来,安徽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 2012 年的 1742 家,增长到 2021 年的 11368 家,制造业增加值、数字经济增加值均超过 1 万亿元。

加快融入长三角　推动高质量发展

“大科学装置助力创新药物研发”“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化学测量学”……8 月下旬,长三角医药创新发展联盟(安徽)在合肥揭牌成立,来自长三角多地的学者、企业家、产业园区负责人聚

首聊创意、谈合作、谋产业。

2019 年 12 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发挥安徽创新活跃强劲、制造特色鲜明、生态资源良好、内陆腹地广阔等优势，推进皖江城市带联动发展，加快合芜蚌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和绿色发展样板区。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关键词，安徽发挥科创优势加快融入长三角。

跨越省界携手科研。安徽合肥和上海张江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深化“两心同创”，协同搞科研合作、成果转化。联合搭建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集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23 个、大型科学仪器超 4 万台(套)。

重大任务合力攻关。面向国家需求，安徽积极推动长三角联合攻关计划布局，实施省级长三角联合攻关项目 63 项，多项联合研发成果已在高端微电子封装、郭守敬望远镜等领域应用。

2022 年 7 月，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取证试飞。在这背后，长三角一体化提供了重要助力。其中，安徽的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为大飞机提供了机组和旅客氧气系统。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未来表面技术有限公司等 20 多家企业，进入大飞机供应商储备库。

“以‘科创+产业’为引领，安徽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与沪苏浙合力将长三角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共同体。”安徽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介绍，今年上半年，安徽从沪苏浙吸纳科技成果 788 项、成交额约 92 亿元，向沪苏浙输送科技成果 713 项、成交额约 59 亿元。

一体化开创新格局，长三角涌现新机遇。沪苏浙皖加快一体化，安徽经济总量占 4 省市比重，从十年前的 14.4%提高到如今的 15.6%。2021 年，安徽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45.7%，较 2012 年提升 10.9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对规上工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 61%，经济质量明显提升。

今年上半年，安徽国内生产总值跻身全国十强，增速居长三角首位。过去十年间，安徽国内生产总值连跨 3 个万亿元台阶，实现了在全国各省市中从“总量居中、人均靠后”向“总量靠前、人均居中”的跨越发展。

安徽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说，安徽要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个制胜关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全国大局多挑担子、多作贡献，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作者：刘菁、徐海涛、陈诺；来源：《瞭望》2022 年第 37 期）

发展“一盘棋” 融合“一家亲”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观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自 2018 年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蹄疾步稳。近日，记者在一线调研采访时看到，三省一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重点领域协同推进、重点区域率先突破、重大项目强化落实、重大平台深化合作，加快迈向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携手共绘发展新图景

秋末冬初，天气微寒。高铁苏州南站建设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高铁苏州南站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湖荡之间，毗邻上海市青浦区和浙江省嘉兴市。根据规划，这座桥式高铁枢纽建成后，将成为沪苏湖高铁、通苏嘉甬高铁、沪苏嘉城际铁路与苏州轨道交通 10 号线四条不同时速轨道线路的交会之处。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苏州正成为江苏铁路建设的主战场，未来苏州铁路网里程将突破 1000 公里，形成连接长三角其他区域的重要纽带。”苏州城际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路明鉴语气中难掩兴奋。

不断延长的铁路线、越织越密的铁路网，驱动着“轨道上的长三角”呼啸而来。统计显示，如今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已达 1.3 万多公里，其中高铁 6500 多公里，陆域所有地级市都有动车通达。

路通了，时空和心理距离压缩了，各种新的发展机遇如同活水，源源不绝。

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的宁马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占地约 200 亩、总投资约 20 亿元的恒精新能源科技公司智能装备制造基地正在加

快建设。该公司副总经理刘江会说:“作为特斯拉的二级供应商,我们总部在上海、客户在南京,毗邻区优越的区位、四通八达的路网,让我们丝毫没有‘跨省’生产经营的感觉。”

“今年以来,我们引进产业项目 17 个,吸引投资292 亿元。今后像恒精新能源这样跨界壮大的产业项目会越来越多。”宁马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管委会区域合作局负责人夏轩轩说。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不仅要打通有形的道路,更要打破无形的行政壁垒,让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让各种制度、标准充分对接起来。

横跨沪苏浙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是人才一体化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去年年底,雅珂迪包装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法国籍总经理万桑一家三口获颁“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工作在苏州可以享受上海市民的“同城”待遇。

“聚焦人才要素合理流动,我们先后出台十余项跨省域人才资质互认共享方面的制度创新成果。包括允许外籍人才跨区域申办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专业技术人才资格和继续教育学时互认等。”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曹远峰说。

培育壮大科创新动能

上海向西,位于沪苏浙交界处、建筑面积约200 万平方米的华为青浦研发中心,克服疫情不利影响,目前 8 个功能组团中已有 2 个实现封顶,预计年底将全面封顶,朝着 2024 年交付的目标稳步迈进。

以华为青浦研发中心为核心,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重点项目西岑科创中心,在碧水烟波的“蓝色珠链”湖畔轮廓渐显。上海市青浦区区长杨小菁说,青浦将联合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共同打造“数字三体”,推动长三角数字干线潮涌向前。

长三角是我国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和长三角区域不仅要提供优质产品,更要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

大科学装置是催生原始创新和尖端科研成果的“利器”。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集中区,布局了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合肥先进光源等 7 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云涛告诉记者,大科学装置之一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已产生多项科研成果并转化为新兴产业,孵化出 20 多家高新企业。目前,可控核聚变中的超导技术、低温技术已开始用于高端医疗装备产业,实现超导质子治疗系统国产化。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是长三角在科创领域的优势所在。合肥备料,上海设计,无锡制造,苏州测试……依托产业链优势,长三角的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据全国半壁江山。

位于江苏无锡的华虹集成电路研发和制造基地是华虹集团走出上海、布局全国的第一个制造业项目。自 2017 年落户以来,项目已完成投资 45 亿美元,目前正全力推进一期项目扩产和二期项目规划。“集成电路产业链充分体现了沪苏浙皖的分工协作、各展所长、优势互补。”苏科创新战略研究院理事长、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陈雯认为。

激发科创新动能,除了强化原始创新,还必须坚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

位于嘉善县的高新企业浙江维日托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从事汽车零部件定制设备的生产研发,需要高精度柔性测量技术。“从市场购买这项服务,价格高不说,可挑选的合作对象也不多。”关键时刻,长三角科技创新券解了企业负责人叶劲卫的“燃眉之急”。

叶劲卫算了一笔账:购买该项技术服务,企业共需花费 51 万元,通过长三角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平台进行兑换后,只需自行承担一半,也就是25.5 万元。

有了科技创新券的加持,企业能便利享受长三角的优质科创资源和技术力量支持,大大提升研发生产效率。今年以来,嘉善已有 380 家企业通过系统进行申请兑付,累计申领科技创新券 1635 万元。

着力实现民生新获得

“昨天提交申请,今天办理户口迁入,实在太方便了!”11 月 18 日上午,在浙江省长兴县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体化出件窗口,江苏淮安人孙莉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 3 月份,孙莉莉在长兴购买了一套房产,想把正在上小学的孩子户口从老家迁到长兴落户。17 日下午,她向长兴县画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咨询,被告知办理跨省迁入可以线上申请、线下

拿证。“原来去老家派出所签字起码一个礼拜,现在好了,小孩上学、大人上班都不耽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一体化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长三角地区经济联系紧密、人员交流频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共享,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是一体化发展的应有之义。

户口迁移无需两地跑、社保卡在多个场景实现“一卡通用”、跨省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覆盖上万家医疗机构……截至今年7月底,长三角跨省通办的政务服务事项或相关应用场景已达138项。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就是要让区域内的老百姓工作生活品质更高。”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主任华源说。

在合肥退休、回到上海安享晚年的俞先生,对一体化发展带来的便利有亲身感受。今年10月,俞先生在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住院,医疗费共计112459元,医保现场直接报销94119元,报销比例约为83.7%。

“长三角一体化的程度越深,群众对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需求也就越高。”合肥市医保中心异地就医管理科工作人员刘贤伟说。目前,长三角地区占合肥市跨省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总人次、医疗总费用的比例超过八成。

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于水系发达的长三角来说,跨界河湖众多,联合治水、共建共享的需求很大。

“联合巡河、联合管护、联合监测、联合执法、联合治理”——漫步横跨江苏、上海的元荡慢行桥上,碧波荡漾、鱼翔浅底,大好风光尽收眼底。元荡村村民陈兴华说:“经过两地联合治理,现在湖边的环境特别好,很多游客都喜欢来这里。”同心结形状的元荡慢行桥,也因此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生动注脚之一。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三省一市将齐心协力,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作者:杨金志、何欣荣、马姝瑞、杨绍功、李平、吴慧珺;来源:新华社,2022年11月)

国有资本助企稳步向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目前,我国已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约9000家。在培育过程中,安徽合肥、浙江宁波、湖南株洲等城市积极探索,各具特色。今天起,本版推出“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系列报道,聚焦三地在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等方面的有效举措。

在安徽合肥,有一座占地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的工厂。生产线上,硅基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在批量产出;实验室里,科研团队夜以继日、攻坚克难。在合肥视涯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丰华看来,公司能够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离不开合肥市政府的产业投资。

从科创新城到产投之城,近年来,合肥充分依托国资平台,通过直接投资、组建和参与各类投资基金等方式,着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今年8月,第四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公布,合肥共有79家企业入选。目前全市共培育14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30家专精特新企业挂牌上市。

国有资本引导,撬动社会资本跟进

2017年,得知合肥拥有比较成熟的产业引导基金投资实体项目的创新机制,视涯科技来此考察。当时公司成立不满一年,硅基OLED微型显示器件项目正值起步阶段,这种模式对于项目即将产业化、资金压力较大的视涯科技来说极具吸引力。

“通过前期考察,我们和合肥新站高新区管委会签订了协议,紧接着,新站产投基金就加入了进来。”丰华回忆,这笔基金实实在在给了他信心,让企业发展更有底气。随后,建厂房,安设备,科研环境日益改善。2019年下半年,新品研发成功,顺利投产。

对于企业来说,基金的及时投入加速了项目落地,不少社会资本紧随其后,更是为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添了助力。“在项目建设第一阶段,合肥产

投集团和新站高新区的投资基金帮助我们解决了25%的出资，撬动了75%的社会资本。这笔经费主要被用来投资固定资产，购买生产设备。”丰华说，国有资本引导，撬动了许多国内上市公司和科创基金跟进投资，也有助于推动产品进一步走向市场。

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果转化则离不开资金。面对成长中的初创企业，仅靠合肥市政府和国资平台公司，财力、人力仍显不足。于是，合肥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引领作用，四两拨千斤，带动更多社会资本跟进。

2021年，合肥市出台体系化的股权投资政策，设立总规模200亿元的政府引导母基金，分行业领域引导社会资本设立各类专项基金，并对基金落户投资、人才引进等给予奖励。截至去年底，合肥市财政累计投入80.97亿元，支持设立产业、创业、天使、纾困、科创等投资基金，建立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基金体系。如今，产业和创业两只基金参股设立36只子基金，计划总规模超1000亿元。

强链延链补链，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

视涯科技最初落户合肥，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结果。对新站产投基金来说，看中的则是企业掌握的关键技术能够有效补链。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不到4个月时间，就签订了投资协议。

“近年来，合肥的产业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方面，更是聚焦全市重点产业链，与强链延链补链有机结合，推动供需双方就地对接。”合肥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以视涯科技为例，2020年，国耀科创基金投入5000万元，为其发展助力；通过产业引导基金直接投资的方式，兴泰资本投入1亿元，支持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如今，合肥的新型显示器件、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已入选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光伏新能源等7个省级、10个市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加快。“十四五”期间，全市正瞄准“芯屏汽合”“急终生智”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

同样从一家普通中小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还有合肥万豪能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起初，随着企业研发投入不断增加，我们也出现了流动资金不足的情况。”公司总经理助理孙义澍说，一筹莫展之际，企业得到了省、市、区政府三级天使基金的投资支持，购置研发设备、推动成果转化有了更多经费。目前，万豪能源这家装备制造业企业，已成为合肥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中的一环。

“在投资的260多家小微科技型企业中，合肥市天使基金针对包括集成电路在内的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占比为37.1%，高端装备制造则占30%。”合肥创新投公司副总经理裴晓辉坦言，天使基金的主要投资方向正是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

适时进退，构建良性循环体系

2015年6月，合肥市天使基金向万豪能源投入500万元资金支持，解了企业燃眉之急。原本约定5年为投资期限，可到了退出的节骨眼上，企业再次急需流动资金周转。

“根据企业资金状况，我们和天使基金进行协商，退出时间延长了两年。”孙义澍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障企业研究经费的持续投入。

在裴晓辉看来，天使基金的连续投资支持和退出与产业发展趋势以及企业实际情况有关。“2020年，考虑到万豪能源设备成熟、团队稳定、成果转化比较成功，结合企业发展潜力，我们决定延长投资时间，继续助力企业发展。”

允许股权协议退出也是合肥市天使基金的特点之一，通过将所持股权增值的部分让渡给科研团队，适时进退，进一步激发企业科创热情。截至目前，合肥市天使基金已在50家所投企业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实现退出，累计收回本金25175万元，其中市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18家。

据介绍，合肥市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累计投资规模达48.22亿元，已进入循环投资阶段，截至9月底，产业引导基金累计回收投资本金13.12亿元；合肥市民营企业纾困发展基金设立的信托金融产品则已累计发放35笔、金额19060万元，回收19笔，金额7600万元。通过完善退出通道，合肥多个投资基金建立了“投资—退出—再投资”的良性循环。

既要扶持产业创新，又要兼顾一定收益，在为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企业成长保驾护航的基础上，国资项目有序退出，有利于财政资金循环使用，持续支持早期项目。“投资的项目，赛道要准确，团队得靠谱，更要符合产业逻辑。”合肥市投资促进局局长吴文利介绍，在投资项目前，市里会进

行尽调和研判，组织现场考察和专家论证把控风险，“政府投资更希望培育壮大产业，时间上更有韧性。有时项目遇到市场环境等问题，我们会和企业一起想办法解决困难，一起‘下河游泳’，而不是站在岸上观望。”

今年6月，合肥市发布《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倍增培育行动计划》，到2025年，合肥计划培育省级专精特新冠军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00家，推动5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上市挂牌。接下来，合肥还将支持地方国有金融机构设立专精特新专项融资产品，力争每条产业链培育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作者：游仪；来源：《人民日报》2022年10月）

靠什么创，为什么新？

近日，安徽省2021年度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公布，合肥新站高新区位列综合排名第2名。单项指标方面，绿色发展和开放创新、结构优化和产业价值链、创新能力和创业活跃度、综合质效和持续创新力均排名前列。

在企业创新破题和区域快速发展的背后，具有多重发展逻辑：从0到1，是创新；从1到N，是递增；从N到N，意味着迭代。创新之花结出产业硕果，高质量发展背后离不开创新驱动。

来到新站，走进企业产线、研发中心和孵化平台，创新创业要素聚合裂变，科创魅力，正在精彩绽放。

从0到1　迸发科技硬核力量

创新，让合肥欣奕华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一路走来“有底气，更有信心”。

为了扭转蒸镀机长期依赖国外企业的被动局面，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合肥欣奕华落户新站潜心研发，经过三年多时间的沉淀和积累，推出了第一代G1 OLED蒸镀封装系统设备，填补了国内显示行业上游核心设备的缺失。

之后，合肥欣奕华持续专注新型国产蒸镀机研发，推出第二代G2.5 OLED蒸镀机以及G8.5 OLED蒸发源系统，均顺利导入客户量产。

合肥欣奕华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区域总经理曹景博介绍，公司每年将销售收入的8%投入到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中，核心团队有超过平均10年的泛半导体领域行业经验，主营的泛半导体行业高端装备、工业机器人以及智慧工厂解决方案，业务覆盖全球泛半导体产业链100多家客户。

为支持落户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区属国有公司通过股权直投、投贷联动、产业基金、厂房代建等方式，推动了视涯、鼎材、福纳科技等高新技术企业落地。新站高新区累计参与设立创投类、产业类、市场化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共计12支，基金总规模132亿元，已累计投放项目66个，项目总投资72.13亿元，撬动社会资本119亿元，为一批优质战略性新兴企业的成长和壮大打下坚实基础。

在新站，看战新。依托“芯屏汽合”主导产业优势，形成大项目“顶天立地”，科技成果“铺天盖地”：合肥京东方第10.5代TFT-LCD生产线成为全球首条最高世代线；乐凯自主研发生产的光学薄膜和光学功能膜，打破国外垄断局面；视涯通过自主创新突破硅基OLED高端制造技术封锁，建成了全球首条专注于12吋晶圆的硅基OLED微型显示创新研发中心和量产生产线……

如今，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烙印着新站创新标签的科技成果，成为上下游配套产业重要组成部分，迈向产业链中高端、关键环，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十年间，该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速20.5%，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速17%，实现了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从1到N　释放创新澎湃动能

创新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整合资源、打通链条、畅通循环。

前不久，井松智能参与的新能源行业标杆智能仓储项目在合肥一家车企工厂成功落地。

自2007年公司落户新站高新区，井松一直在智能仓储物流行业的“星辰大海”中踏浪前行，狠抓AGV、堆垛机、穿梭车等智能仓储物流设备研发技术。

“深耕工业制造业，为井松智能带来持续的竞争力优势。”井松智能董事长姚志坚介绍，企业瞄准新能源行业仓储物流需求，创新设计了智能物流仓储系统解决方案，助力该车企的超级工厂项目建设。

凭借行业地位和科技实力，今年6月，井松智能在上交所科创板正式上市，登陆资本市场。今年

以来,新站高新区先后自主培育了劲旅环境、汇成股份、翰博高新等4家企业上市，资本市场中的“新站企业”不断壮大。

科技创新在企业壮大、产业升级、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区已有规上工业企业136家,“专精特新”企业69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家,发展后劲充足。

企业规模不断壮大,战新产业能级持续提升。2021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同比增长67.8%，规上工业研发经费占比达到5.8%,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10.6%,走出业绩效益“微笑曲线”。

从N到N 竞逐科创新赛道

有平台才有舞台,有活力就有人才,有机会才有更大作为。

——树立科技即产业理念，建立常态化的招商引资机制。1–9月份,对接产业链和新型研发机构等项目132个,全区累计签约项目55个,涉及投资额200多亿元。

——组建3个服务指导专班,协调税务、市场局等部门,开展“点对点”辅导,不断壮大辖区高企规模。预计到年底,有效期内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将突破240家,同比增加42%。

——围绕“一室一中心”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打通学校“实验室”与产业“应用场”。截至今年9月底，技术合同登记交易总额43.77亿元,科技成果登记累计完成180余项。

平台载体星罗棋布，科创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数据显示,全区已拥有国家级、省市级孵化平台12家，孵化载体面积超17万平方米，入驻企业超700家，孵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5家。

10月20日，新站高新区与安徽省德裕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联手打造诺言科技孵化园区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将为新站区不断引入、培育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增添发展新动能。

同时，新站高新区提前谋划科技创新自有自建载体,目前,已规划建设了科创大厦、数字科技产业园等一批国有优质载体70万平方米,为项目孵化、科技招商、人才集聚等提供了有力支撑。

打造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发挥人才政策的磁场效应,就要在人才培养和留住人才上下功夫。今年以来，新站高新区累计发放新落户人才租房补贴5641人次、497万元，发放重点产业企业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21068人次,共计4718万元,推动职住平衡、产城融合。

向“新”而行,“城”势而上。新站高新区将继续抓好“创新是第一动力”,整合创新资源、培育创新主体、提升服务能力,让科技创新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努力成为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作者:张敏、费维飞;来源:“合肥新站区”微信公众号,2022年11月)

疫情挡不住合肥的展会

11月17日上午,2022世界集成电路大会在合肥正式开幕。新闻上说,本次大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是集成电路领域首个部省主办的国际化大会。

这是合肥举办的又一场国家级、国际化大会!

11月18日是第五届世界声博会暨2022年科大讯飞全球1024开发者节,11月19日又有2022中国·合肥苗木花卉交易大会……

这些，只是合肥今年以来举办的各类展会及重大活动的一部分。

有一个发现

我们仅看下半年，就能一窥合肥举办各类展会及重大活动的“密度”:

8月——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大会、中国（合肥)国际装备制造展、中国黄山书会等全国性大型活动;

9月——全国“双创”活动周、世界制造业大会、2022量子产业大会、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

同时，合肥在10月、11月安全有序组织了7.6万人参加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9.5万人参加的成人高考。

梳理一下媒体报道，我们竟然发现，今年以来，合肥已经陆续举办各类展会及重大活动127场,平均每月达10余场!粗略估计一下,接待来宾有200万人次!

这其中,有国家网络安全周、全国“双创”活动

周、世界制造业大会等 10 余场重大展会，各类比赛活动达 50 多场。

重大会展活动，汇集多方资源，折射出一座城市在这个领域的“江湖地位”。一场场“群贤毕集”的盛会，让办展的“有说头”、参展的“有赚头”、观展的“有看头”，更提升了合肥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

可是，大流量的人群聚集，对大城市疫情防控来说，不亚于一次次“大考”。

省会城市、千万人口城市、长三角副中心城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这样的合肥，如何迎接一次次“大考”，值得我们一探究竟。

合肥的答案

在疫情点多面广频发的背景下，如何敞开大门，接待来自全世界的客商，安全有序地保障一次次大型活动？

合肥的答案是——慎终如始防控好，事不避难服务好！

这不是我说的话，是 11 月 3 日合肥市防疫指挥部第 110 次工作视频会商会上的话。

我有朋友在合肥市从事疫情防控工作，他告诉我要关注合肥的疫情防控，要点是看市媒体平台发布的通告。按图索骥，我详细查阅今年初以来合肥市发布的一两百条新闻稿和通告，找到这样几个关键词：高效统筹、科学防控、全程保障。

第一个是高效统筹。

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定不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这都是全国统一的要求，关键看如何落实、如何高效落实。

合肥始终坚持扁平化指挥体系，举全市之力定期会商、随时会诊，以快制快、以变应变。合肥市委主要领导先后主持召开 116 次“兵棋推演”视频会商短会，全市应急指挥体系始终处于激活状态。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抓总的 13 个工作专班，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以科学之策应对非常之难，确保防疫难中求成、经济稳中求进。

好多有合肥特色的决策，都是高效统筹、果断决策的结果。比如，疫情防控期间，启用“黄码医院”，设立黄码采集点和专用通道；“上班族”参加区域核酸检测可以迟到早退或请假半天；学校线上教学期间，双职工家庭可以 1 人请假照顾孩子；上网课期间，学生可享受“绿色通道”，优先参加核酸检测；每天早起上班或打工的市民，安排有非常便捷的“出门检”……还有很多，我都数不过来。

第二个是科学防控。

合肥市统筹应急性处置和常态化防控，构建平战结合的科学防控体系，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举措，以始终保持放心不下的尽责心态，科学精准抓好疫情防控。

“新冠疫情太狡猾，合肥‘五检’对付它！”网友说的“五检”，是落地检、出门检、跟踪检、重点检、兜底检。

这“五检”，不简单。比如“落地检”，在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高速公路省界服务区、港口等地设置核酸采样点，按照“自愿、免费、即采即走、不限制流动”的原则，面向跨省的流动人员提供核酸检测服务，这是合肥在全国率先开展的，今年 1 月 17 日春运起就做起来了。还有“出门检”，因工作特点流动性大的装修维修、快递、外卖、保安、保洁、家政等从业人员，无紧急情况，每日早晨出门前必须先采样、再出门，所在单位要允许其迟到。跟踪检、重点检、兜底检，都是合肥结合实际推出的便民之举。

科学防控，做到什么程度才科学？有一个合肥案例。今年 4 月 17 日，合肥在全国大中型城市中首个开展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实战演练——“雨前行动”。通过系统地“检”、深入地“查”、全面地“练”，达到了摸清底数、查找问题、优化流程、提高能力的目的。

没想到，第二天，这次实战演练就派上了用场——蜀山区“4·18”疫情突然来袭，合肥市第一时间果断处置。

今年以来，合肥一次次遭遇疫情，都是以快制快、以变应变，都打赢了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进一步检验了应对疫情防控严峻复杂局面的能力。

合肥还有一个做法挺科学。他们创新推出“管人不关店”措施，对风险人员活动轨迹涉及的商业综合体、超市等，密接不漏一人管控。但经营场所经过环境消杀后，可在保证安全前提下继续经营，深受广大经营户的欢迎。华润万象城等城市综合体、淮河路步行街等，都没有受到疫情的太大冲击。

这一条不搞“一关了之”，不能不说真有胆识！

第三个是全程保障。

不论各类展会还是重要活动，合肥市都全力做好现场防控工作和全程跟踪服务，全程及时提供免费防疫指导，坚决做到“力求精准、力求方便群众”。

从通告中可以看出，合肥对重要活动成立工作专班驻点服务，指导落实落细疫情防控措施，保障活动安全有序。

对大型聚集性活动，实行报备审批制。市会展疫情防控工作专班督查酒店近 4 万家次，督查领取活动 5000 余场，为全市 3600 家酒店和大型展馆的有序运营提供了强力支撑。

因为非常努力，所以安全有序。127 场展会活动，200 万接待人次，没有发生一起疫情传播，真正做到“零感染”。这一点，不服不行。

随着世界制造业大会、国家网络安全周、全国“双创”活动周、世界集成电路大会、中国苗交会、世界声博会等国际展、全国展的成功举办，合肥会展竞争力持续增强，继续名列中国最具竞争力省会城市。

城市成就展会，展会赋能城市。“疫情防得住，会展办得好！”“这么大的展会规模，这么细致的贴心服务，充分展现了高超的城市治理水平！”“这样的合肥，令人钦佩！”……无数网友的点赞，无数来宾的口碑，让合肥的美誉度越来越高。

关键在精准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这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三条都要做到，一条不能落下，可谓相当不容易。

今年以来，合肥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疫情形势总体较好、经济运行不断向好、社会大局平稳安好。

从合肥市经济运行发布会通告中，我又注意到有两个经济指标值得关注。一是工业投资。今年以来，合肥工业投资一直保持 20%以上的增速！10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竟然达到 14.3%！二是财政收入。合肥财政收入前 10 个月增长 9.9%，比全国高 4.8 个百分点。真是不简单！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统筹的关键在精准——“精准是方法，是担当，更是能力”。合肥市防疫指挥部第 112 次工作会商会上的这个说法，可以说相当精辟。

从几个专班运转的情况，就能看出这个统筹能力——

稳发展工作专班——协调解决企业在重要物资通行、运输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千方百计为企业纾困解难；

交通工作专班——数千名工作人员 24 小时轮流严守高速道口和飞机场、火车站，筑牢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

保供工作专班——保障蔬菜、肉食、粮油等生活必需农产品，保供应、稳物价，满足合肥市消费需求，守护市民“烟火如常”……

我们都知道，周谷堆是合肥的“菜篮子”。11 月 8 日，因一省外大货车司机引发疫情传播风险，合肥果断决定，对周谷堆市场及周边相关区域采取强化管理措施。

本来市民都很担心，蔬菜会不会断供，物价会不会暴涨。没想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周谷堆市场继续保持正常运营！

采取管控措施的几天里，周谷堆的经营人员和管理人员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和 N95 口罩，坚持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既保障合肥的蔬菜供应，又打赢了疫情歼灭战。

疫情之下，发展向上，合肥的胸怀与底气尽显。

“来的都是客人，返的都是家人”“管人不关店”“婚礼应办尽办”……当防疫与温暖同行，合肥在一次次击中人们“泪点”的同时，用自己的超常努力保障着市民的如常生活，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向好！

当前，境外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国内防范疫情反弹任务仍然艰巨繁重。

合肥市防疫指挥部第 116 次工作视频会商会说，经过全市上下不懈努力，当前合肥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好，与此同时压力越来越大、责任越来越重。

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合肥正在全面落实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重量级的展会，在这座城市盛大举办！

更多精彩，值得期待。

（来源：“合肥发布”微信公众号，2022 年 11 月）

安徽合肥精准多元施策——支持中小企业创新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升科技投入效能,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

近年来,为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安徽省合肥市加大科技投入,精细化构建对科技成果转化与企业创新的“扶帮推”政策体系。

起步——种子基金“扶一把”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教授陈旸带领团队正在对分布式光纤声波/振动监测仪进行产品测试。

“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发生时都会产生振动,若能连续监测,有利于及时发现潜在危险并发出灾害预警,降低损失。”陈旸介绍,自 2019 年起,他和同事攻关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分布式光纤传感系统,这套系统曾为北京冬奥会冰壶赛场提供了温度监测保障。

“在将技术变为产品的过程中,第一步就遇到了困难。”陈旸介绍,由于分布式光纤传感系统多依靠学校的实验室设备,理论模型虽然成熟,但要大规模生产相应仪器,需要重新构铸模型,但实验室的课题经费无法支撑科技成果转化。

这一情况引起了合肥市科技成果转化专班成员王瑞芳的注意。“陈教授的实验室设备齐全,项目也完成了前期实验。”王瑞芳说,“技术市场认可度高,团队也有转化需求,经过考察,我们认为这个项目的转化成功率比较高。”王瑞芳为陈旸支招——试试申请合肥市科技成果转化种子基金。

着眼于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把科研成果从实验室里“搬”出来,合肥市于今年 5 月设立了扶持科创项目起步的种子基金,重点扶持高校院所与初创企业。王瑞芳介绍:“一方面,种子基金能够给初创型科技企业提供项目启动资金,并建立风险容许机制,允许出现最高不超过 50%的亏损;另一方面,种子基金可以帮助链接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更好服务项目落地。”

今年 5 月,在合肥市科技成果转化种子基金投委会上,陈旸团队主导的“分布式光纤传感设备研发项目”高分通过评审,得到了基金支持。招人员、购设备、谈合作……在种子基金扶持下,陈旸团队已经成立公司,在设备元器件购买、野外实验开展等方面有了进展。团队自主研发的产品,正一步步迈向市场。

截至目前,合肥市科技成果转化种子基金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51 个,全年计划支持 70 个项目。“未来种子基金将进一步加大对科创项目在起步阶段的支持,为科研工作者和初创企业减轻后顾之忧。”王瑞芳介绍。

发展——研发补助“帮一把”

一笔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补助到账,让合肥微晶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副总监吴义良喜出望外。作为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合肥微晶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石墨烯和纳米银线等新材料的应用开发。

去年,围绕石墨烯的研发应用,这家企业同步研发了 4 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吴义良介绍:“从散热浆料到抗菌浆料,新材料的应用前景非常广泛。但由于同步开展多个项目,每个项目研发周期不一致,申请研发补助的时间往往不一致,这就导致一年内会提交多次申请,有时还可能错过申请时间。”正当吴义良为申请研发补助犯愁时,合肥市于 2021 年 2 月出台了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补助专项政策。

“对照政策,逐项比对,符合条件,便可立即申请。”吴义良说,他登录合肥市产业政策管理平台,提交财务报表,上传项目研发立项、批复和验收文件。没过几天,就有合肥市高新区科技局工作人员来到公司研发部门,现场了解项目进展,实地考察研发产品。“今年 2 月底提交的申请,1 个月后研发平台就收到了补助资金。”在吴义良看来,研发补助申请不仅效率高、速度快,还可以提高中小企业科研投入的积极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王瑞芳介绍,聚焦帮助中小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等方面,合肥市制定了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三年攻坚行动方案,对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补助,按照研发费用的 15%给予最高 100 万元的补贴。得益于对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精准支持,今年上半年,合肥市共有 4892 家企业进

入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同比增长 54.7%。

攻关——多方合力“推一把”

今年年初，在合肥御微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帆正带领团队重点开展套刻误差量测研发工作。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个技术难题：如何研发与应用高精密套刻检测光学系统？“一项技术攻克不了，就很难往下继续进行。”王帆介绍，“要想实现测量产品落地，往往需要把多种技术高度融合，而一家公司或者一个科研团队往往很难掌握多项核心技术。因此，燃眉之急是要与国内研究这项技术的团队合作。但公司实力有限，很难自己寻觅到合适的合作对象。”

就在这时，合肥市开始征集“揭榜挂帅”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需求，帮助企业与高校科研团队在重大科研攻关阶段取得突破。

得知合肥市为企业搭建平台征集技术难题，王帆第一时间报了名。从介绍项目背景，到提出技术难点，在今年 7 月以“揭榜挂帅”为主题的科创对接活动上，王帆的企业现场“发榜”。“路演一结束，当场就有几个科研院所和我联系，想进一步了解项目进展。”王帆说，经过筛选，公司最终选择与安徽光机所光学遥感中心团队合作，进行产学研攻关。对王帆来说，在政府支持下，“揭榜挂帅”在企业与高校院所间搭起一座桥梁，不仅可以降低沟通成本，提高科研效率，还可以精准解决企业需求，助力创新成果更快走向应用市场。

得益于技术难题的不断突破，合肥市今年首批申报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3206 家，同比增长 40.6%。

目前，合肥市“揭榜挂帅”项目中有 62 个正与潜在揭榜方洽谈，38 个项目已经签约或即将签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我们将进一步支持高校院所、重点企业瞄准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开展科研攻关。在高校院所、高新企业等成功‘揭榜’的项目中，择优给予政策、资金方面的引导支持。”合肥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说。

（作者：游仪；来源：《人民日报》2022 年 11 月）

合肥：打造产业投融资“合肥模式”

一、经验做法

产业投融资“合肥模式”，核心是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引领作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是聚焦产业发展定位，找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通过国有资本投入，带动社会资本进入，共同培育发展产业项目。

（一）科学确定产业投融资项目

1.找准产业发展方向。合肥抓住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以及中部崛起国家战略机遇，聚焦家电产业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引进重大项目、完成工业积累，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家电产业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元，形成“合肥制造”的产业集聚优势。产业发展始终围绕产业链上下游深挖“风口”产业，通过政府投融资引入关键企业，然后带动产业链条上其他企业陆续入驻。近年来，合肥引入培育京东方、科大讯飞、长鑫、蔚来等龙头企业，逐步构建起以“芯屏汽合”、“集终生智”为代表的几十条产业链。

2.打造招投专业队伍。合肥从市领导到普通招商人员，都在深入学习研究产业投融资政策、行业发展报告、上市企业招股等各种与产业相关的信息。另外，通过政府高校常态化互派挂职机制，培养一批产业招投专业人才。比如，市直机关某干部在中科大挂职项目挖掘经理 7 年，帮助科研人员梳理专利成果、对接市场需求。工作性质要求他必须精通专业知识，才能提出如专利侵权与否、专利的市场化前景等建设性意见建议；必须精通各类政策和谈判技巧，才能与政府部门、风投、企业等不同领域人士有效沟通。

3.研究产业招商内容。围绕新时期主导产业发展方向，编制实施重点产业招商目录，对主导产业全链条龙头企业、总部机构、独角兽企业、行业冠军企业和新兴企业进行梳理并形成重点招商名单。比如，产业链招商指南，在综合大量文献资料和行业报告的基础上，聚焦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智能家电等重点产业，对 24 个细分领域，从产业趋势、市场布局、产业政策、产业链全景，到每个目标企业、对接平台等，都通过文字、数据、图表的方式进行详细解读。

4.设置科学论证程序。对于拟投资的重点产业项目，由产业领导小组牵头，联合专业投资机构

和专业人士，从产业方向、竞争环境、发展空间等层面，做好全面尽职调查、市场前景评判等科学论证。比如，合肥在决定投资蔚来之前，通过四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高度关注国家政策导向对引进项目的支持情况；二是积极对接专业投资机构，对技术、供应链和市场等进行全方位的研判；三是委托专业机构等对企业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四是同企业开展详细、周密、严谨的商务谈判。五是建立科学决策制度。在政府确定拟引入项目后，首先报市人大财经委，财经委审定后报市人大主任办公会，主任办公会通过后再提交市人大常委会，最后通报市政协。所有拟投资项目都需经过以上决策流程才最终确定投资。

（二）创新产业投融资模式

1.完善政府资金投入方式。为更好发挥政府资金对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合肥整合各类政府资金，在投入方式上做出重大调整。一是将之前“撒胡椒面”式的资金投入方式，转为加大对重点产业领域和重点产业项目的投资。二是大幅压减事后奖补等无偿投入，新增基金投入、“借转补”投入、财政金融产品投入3种市场化有偿投入方式。新的投入方式，更好解决了企业在项目前期和中期面临的资金紧张问题，更好实现了“拨款变投资、资金变基金”的市场化投融资方式，有限的政府资金也更加聚焦优势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2.组建专业化国资平台。合肥对国有资本营运机构进行重组整合，组建三大国资投融资平台：一是合肥建投，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现代旅游、交通等；二是合肥产投，专注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合肥兴泰，打造地方金融控股平台。同时，出台或修订投融资、担保、产权交易等40余项制度，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比如，针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平台公司债务风险压力较大的情况，国资委以全面预算管理为抓手，对企业资产负债率及负债预算水平进行压降调控；通过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方式降低融资成本，多渠道增加资本金投入，改善资产负债结构，确保企业资金链安全。

3.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合肥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杠杆撬动作用，通过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方式，引导更多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合肥形成总规模超过1千亿元的基金，带动社会投资近4千亿元。其中，为支持初创企业、中小企业，成立总规模59.2亿元的创业引导基金、产业引导基金和天使基金，带动社会资本投资超过2千亿元。组建总规模近3百亿元的芯屏产业投资基金，全部投向合肥市集成电路和平板显示上下游产业链。

4.完善国有资本退出机制。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合肥形成“引进项目→国资投入引领→项目落地→股权退出→循环支持新项目发展”的产业运作模式。政府产业投资基金形成的基金份额或股权达到投资年限或约定退出条件时，依法依规通过上市、股权转让、企业回购及清算、份额退出等市场化方式安全退出。这样，国有资本在完成培育引入产业项目使命的同时，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做大做强。通过国有资本的循环使用，推动产业快速发展。

（三）打造优良产业发展生态

1.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合肥对产业扶持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形成“1+3+5+N”的政策框架体系。“1”是指《合肥市扶持产业发展政策的若干规定（试行）》。“3”是指3个政策资金管理办法。“5”是指5大产业扶持政策，包括各产业扶持的重点及采取的具体投入方式。“N”是指各产业政策执行部门可按照相关规定，量身定制具体实施办法。产业政策体系的整合有效防止政出多门，增强政策的协调性和联动性。

2.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合肥围绕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材料等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引进和培养产业技术人才，先后出台“人才政策20条”、“人才政策新8条”等，配套制定“产业紧缺人才引进计划”、“青年优秀人才培养计划”等实施细则34项，形成较为完整的人才政策体系。启动合肥国际人才城、人力资源产业园建设，打造综合性服务平台。提高企业家待遇，发放可享受户口、医疗、教育、税收等各方面优待的绿卡等。由政府主导建设人才公寓，出台人才公寓建设使用管理办法，完善人才住房保障等。

3.打造创新孵化平台。建设以大科学装置公司为代表的资源集聚平台、以创新院公司为代表的协同创新平台、以离子医学中心为代表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以长鑫存储为代表的自主研发创新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转型升级。按照“协同创新、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原则，大力集聚国内外高水平高校、（下转第64页）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2年总目录

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全球视阈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本质要求与世界意义……王玉堂(6-3)
近十年我国基层党建创新的特点、动因与绩效
——基于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的多案例文本分析……李　槿(6-10)

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坚持敢于斗争是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王玉堂　杜玉晶(1-3)
伟大建党精神研究述评……杜烨能(1-7)
以伟大建党精神滋养党性修养的作用机理和实践进路……周凯丽(1-13)
不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王玉堂(2-3)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探索……孙　浩(2-7)
中国人民从精神被动转入精神主动的历史嬗变……杨　琳(2-15)
坚定不移把新时代伟大自我革命推向纵深……吴　斌(2-20)
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工作演进的百年历程及经验启示……卢烁乐(3-3)
三重逻辑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百年探索及经验启示……宋迎迎(3-11)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逻辑……张　帆(3-16)
发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王玉堂(4-3)
批判与超越：比较视野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李景平　吴晓(4-8)
关于百年党史中三个《决议》的比较研究……吕亚楠(4-13)
坚持底线思维：中国共产党的制胜之道……郭小丽　王玉堂 (5-3)

策论园地

稳定优化产业链供应链　提升安徽产业现代化水平 ……李红梅　孙韩　王莉莉　何婷婷(1-18)
防范化解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风险的实践研究
——以合肥市为例……高小明　朱春霞 (1-23)
合肥市商贸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问题及策略分析……王　莉(1-28)
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法治路径……宋寒亮(1-31)
泰州科技人才发展成效、问题与路径研究……于　江(1-34)
关于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若干思考
——基于合肥市宗教工作大督查经验的浅析……合肥市委统战部课题组(2-25)
安徽省政府专项债券问题研究……吴义达(2-29)
领导干部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 李　平(2-35)
合肥市加快推进全域美丽乡村建设路径研究……徐小满(3-21)
疫情背景下合肥市消费品进口状况分析……王　莉(3-26)
共同富裕中基层党组织主体协同探索
——以宁波党建联盟为例……齐　峰(3-29)

新时代党建引领“零距离”为民服务的实践与思考
——以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为例……杨艳梅(3–33)
三孩政策背景下安徽青年生育观的特征、成因与政策建议……邓　祺(4–20)
优化人才环境、深化“养人之城”建设路径探析
——基于合肥的地方实践研究……尹　洁(4–25)
加强党对农村集体经济领导的实践探索与对策建议
——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杨艳梅(4–29)
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通州样板” ……于　盈(4–34)
合肥市加快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示范之城研究
——以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例……合肥市委编办课题组(5–7)
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对策建议
——以北京市 J 社区为例……杨艳梅(5–15)
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及对策建议……吴　昌(5–20)
通州区新型储能产业调查与思考……李进儒　于盈(5–24)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以南京市浦口区为例……南京市浦口区委党校课题组(5–30)
安徽省科技创新环境评价研究
——基于与江浙沪的比较……汪晓梦(6–17)
安徽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及路径选择……陈华彬　陈再勤　孟超峰　胡峰(6–23)
合肥市推进林长制改革的主要做法及提升策略……王永龙　夏琦　尹俊　朱梦姗(6–28)
长三角地区旅游消费潜力释放机制与路径研究……武优勐　匡祖欣　杨丽姣(6–30)
“城市大脑”建设:价值意蕴、短板审视与优化路径……刘雅静(6–36)

学思札记

《共产党宣言》的意识形态思想及启示……李春来(1–40)
试论新时代制度强国建设……王远才(1–43)
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发展研究……韦志兵(1–47)
论信息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何金海(1–51)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四维”引导……何红连　陈黎梅(2–4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综述……曲直　程晋富(2–4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史”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原创性贡献……田天亮(3–38)
安徽近代历史名人的地域分布特点及成长启示……马 俊　葛 刚(3–45)
论红色旅游景点对政治记忆的承载功能
——以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为例……鞠瑞霞(3–4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三维透视……杜烨能(4–38)
论恩格斯晚年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高雨欣(4–42)
列宁对经济主义思潮的批判及其方法
——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为中心的考察……尚英萌　孙迪亮(5–33)
青年团早期团内教育训练的实践探索与现实启示(1922–1927)……王　淇(5–41)
国内学界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杨荣刚(6–41)

信息荟萃

“合肥科创‘出圈’”等四则……(1–58)

“合肥：创新的天地”等六则……（2-54）
“合肥高新区：勇当‘创新先锋’”等八则……（3-52）
“谱写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等十则……（4-49）
“科创合肥”等六则……（5-49）
“创新驱动 安徽跨越”等七则……（6-48）

（上接第 61 页）

科研院所，合作共建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转化链条，从创新资源方面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二、主要启示

合肥通过找准产业“风口”、优化投资决策制度、打通创新服务产业通道、用好政府政策资金，把握投资机会，实现产业集群式、规模式发展。

一要找准产业发展定位。合肥结合自身优势，始终主攻产业链关键环节和价值链高端环节，引入头部企业后，围绕全链条布局、全要素配置、全方位推进，形成几十条重点产业链。比如，合肥长鑫存储，正是基于集成电路产业市场规模大、工艺迭代速度缓的判断，精准选择 DRAM 型存储芯片这一关键细分领域，与北京兆易创新合作成立的。长鑫存储不但打破了国外厂商多年来在 DRAM 产业的垄断，也吸引了一大批半导体企业落户合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等资本入驻。

二要用好政府引导资金。新的产业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很难完全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发展，尤其是需要重投入时，市场化资金出于短期回报考虑很难参与其中，这就需要政府资金在相对长的时间内陪伴企业和产业成长。合肥通过设立引导基金“以投带引”，撬动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和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双赢。但与普通风险投资不同，政府投融资的目的不是为了高额回报，而是通过招引优质产业项目，推动地方产业更好发展。

三要完善专业招投人才体系。专业人做专业事。合肥成功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培养本土招投团队、借助外部人才力量构建强大的招投人才体系。政府招商团队从上到下都投行化、专业化，一个基层的招商员都具备全产业链知识。另外，合肥大量聘请知名企业家作为招商顾问，通过企业家间的关系帮助政府招商。针对所有主导产业，建立全球该领域最顶级专家人才数据库，选择项目时邀请各领域顶级专家评价。

四要建立科学的决策制度。合肥在对拟投资项目进行科学严密的调查论证后，还需经过市人大财经委、市人大主任办公会、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协同意。通过市人大、政协汇聚社会各方面的建设性意见，更大范围保证投资决策的科学性。重大产业项目投资的科学论证程序和决策制度，能够最大限度确保投资决策理性，最大可能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成功率。同时，详细深入的尽职调查，可以形成在招引龙头项目时的比较优势。

五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动力之源。近年来，合肥注重将科研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通过中科大系、中电科系（16 所、38 所等军工院所）、本地系（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三架马车，大力发展培育创新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目前有“安徽创新馆”、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等 60 余家新型研发机构。通过这些新型研发机构，真正将各类科技创新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强有力推动了产业快速高质量发展。

（作者：孟宪平；来源：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2022 年 11 月）

本栏目供稿、责任编辑：黄宁平

启 事

本栏目属转载文章，因客观原因未及与作者提前沟通，请作者看到本启事后，与本刊编辑部联系（电话：0551-62206629），编辑部将按本刊相关制度向作者支付稿酬。

公益广告

图说 我们的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德不孤必有邻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901号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0551）62206658　62206629
电子邮箱：XB1233@126.com

印　　刷：合肥新南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自办发行
定　　价：5.00元

ISSN 1674-5000